

政法研究

ZHENG-FA
YANJIU

MF

3 APR 29

CONF

1959

6

1959

PLEASE RETURN TO
R EASTERN LAW DIVISION
LAW LIBRARY

4048. - 04-4660

copy
10



政法研究

一九五九年 第六期目录

社論	坚决与右傾机会主义斗争到底	[1]	
社論	在十月革命的紅旗下胜利前进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联合国大会十四届會議 通过所謂“西藏問題”的非法決議的声明			[7]
联合国干涉“西藏問題”是非法的			周 敏 生 [8]
反对美国借口維護人权和自由来干涉我国內政.....			傅 鑄 [12]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执行局會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 問題的決議			[14]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在北京举行执行局會議			本刊記者 [15]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通报			[14]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声明 ——抗議老撾当局非法迫害老撾爱国战綫党领导人——			[17]
老撾緊張局势是美、薩集团一手造成的			孙 承 谷 [18]
政法工作要坚持和发揚党的走群众路綫的光荣傳統			司 景 芳 [22]
論无产阶级的自由观与资产阶级的自由观			协 之 [27]
改造罪犯政策的偉大胜利			顧 方 平 [35]
审判工作怎样貫徹群众路綫			王 云 生 [38]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			張 健 [42]
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学說的虛构性和反动本质.....			康 树 华 [47]
动态:			
北京政法学院开展科学研究概况			[55]
湖北大学法律系結合教学开展学术活动			[46]
四川政法公安学院科学研究簡况			[21]

政法研究

(双月刊)

1959年 第6期

12月2日出版

編輯者

政法研究編輯委员会

总发行处

北京市邮局

北京东城区王福海胡同3号

电话: 4.4351

出版者

法律出版社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北京东城区十二条老君堂9号

电话: 4.3851

印刷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代訂零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定价: 每册 0.30 元

上期实际出版日期 10月12日

社論

坚决与右傾机会主义斗争到底

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下，我們党正在进行着反对右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是我国十年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是一场非常激烈非常深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保卫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严肃斗争。

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经过 1958 年的大跃进，不只使社会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正在迅速地建成，而且使社会主义革命走向了更加深入发展的阶段，引起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所有领域内的一系列的重大变革。其突出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我国广大农村中迅速地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运动是我国农村中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它迅速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飞跃前进。大跃进不仅改变着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面貌，而且进一步突破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束缚，大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本位主义思想，大大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使劳动人民的革命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样，当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的新的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子正在被最后消灭时，就不能不引起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反抗。党内一小撮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极力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的领导 and 政治挂帅，反对大搞群众运动，这实质上正体现了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敌视和反抗，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反映。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反对在党的总路线指导下，高度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所产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伟大新鲜事物，企图坚持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代替无产阶级世界观，企图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变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路线。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一条既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可能性，又充分估计到了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主观能动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它的本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党的总路线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党的总路线一经贯彻执行，就立即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形成了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的新高潮，出现了 1958 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大

跃进和1959年继续跃进，大大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高速度的发展。可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反对党的总路线，他们把群众不断革命的进取精神，诬蔑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到处泼冷水，散布悲观主义情绪，宣传开倒车。这正是资产阶级反抗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表现。

我们党所领导的大跃进运动，是党依靠积极分子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我们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是我国人民获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实现我国革命的远大目标的力量源泉。大跃进的群众运动，就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高速度地把少数先进生产者的生产水平变成全社会的生产水平的运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抹煞群众革命运动中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故意夸大新事物发展中由于经验不足产生的工作中的个别缺点，他们到处吹毛求疵，挖空心思地想办法拉革命群众运动的后腿，对大跃进进行无耻的诽谤，这正是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情绪，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是中国几亿农民为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它是去年大跃进中农业生产大发展和农民社会主义觉悟大高涨的产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人民公社的本质，是根本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思想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他们企图用所谓“包产到户”之类的形式来破坏集体所有制，恢复单干，使农村重新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完全正确的，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英明的、伟大的。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所以反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最基本的原因是他们不喜欢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不喜欢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是资产阶级思潮的代表，在农村中又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代表。他们企图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提出的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相对抗的纲领，基本上有两条：一条是反对党的领导，再一条是反对群众运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政治挂帅，就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样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群众运动，就不能够充分发扬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就不能够高速度地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一切方面毫无例外地都贯彻实现党的领导，对此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是我们一切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只有紧紧依靠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我们才能把总路线贯彻到底。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总路线，实质上也就是反对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我們必須堅決維護黨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徹底粉碎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反黨陰謀！

我們黨的一切事業，都是人民群眾的事業。黨的路線和政策，從來都是通過群眾運動實現的。我們黨所以一貫重視群眾運動，是從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觀點出發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人類社會的歷史，歸根到底，是生產的歷史，是生產者的歷史。從這個根本觀點出發，我們黨几十年來，無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在建設時期，都一直堅持大搞群眾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就是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革命運動。我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如果離開了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社會主義勝利是不能設想的。可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卻把群眾運動看成是可怕的災難，他們抓住群眾運動中的個別缺點，加以夸大，說這個“搞亂了”，那個“搞糟了”，到處興風作浪，散布資產階級的悲觀情緒，企圖捆綁群眾的手腳，把群眾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壓抑下去。事實上，千百萬人民群眾起來大搞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產生某些缺點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這些缺點，較之群眾運動本身所創造的巨大成績，却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事實上，在黨的領導下，通過群眾的努力，一些難免的缺點又都得到很快的克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喜好搜求和夸大“缺點”，根本不是為了克服缺點，而是為了反對群眾運動，反掉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企圖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半途而廢，企圖使資本主義死灰復燃。

自去年大躍進以來，我國政法戰綫也出現了新的氣象，這表現在：政法幹部思想覺悟大大提高，對貫徹黨的領導的重要意義認識更加明確，進一步把政法工作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廣大政法幹部為保衛生產和黨的中心工作服務的思想，更加明確；政法工作和生產勞動更加緊密地結合；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更有新的創造和發展；廣大政法幹部的工作積極性、創造性更加發揚。因此，政法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樣，自大躍進以來也獲得了光輝的成就。

可是有一小撮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在他們抹煞大躍進的成就同時，也抹煞政法戰綫的顯著成就，他們存在着嚴重的資產階級法律觀點，強調“司法獨立”，反對接受黨的領導，“孤立办案”，脫離群眾，對黨的政法工作的路線的貫徹執行，橫加指責，進行攻擊。把去年大躍進以來的政法工作的偉大成就完全否定，對群眾創造出來的許多先進經驗完全否定，對政法先進工作者潑冷水。企圖奪取我們政法戰綫的陣地，來反對黨的總路線的執行，窒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革命群眾運動。他們反對我們對地、富、反、壞、右等反動分子實行專政，反對我們通過人民民主專政來保衛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他們妄圖把專政的矛頭指向人民內部。他們的最終目的是企圖利用人民的“刀把子”，反掉無產階級專政。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種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陰謀，我們必須徹底予以揭穿和粉碎！政法戰綫當前應該集中全力反右傾、鼓干劲，保衛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為貫徹黨的八屆八中全會決議，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繼續躍進而奮鬥。我們政法戰綫上的同志們必須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緊密依靠群眾，堅決打擊一切反社會主義的破壞活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

的順利发展。

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具有极其重大、深远的意义。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我国目前的主要危险。同右倾机会主义展开不调和的斗争，粉碎右倾机会主义，彻底消除它的影响，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这场斗争，关系到“谁战胜谁”的问题，十分明显，只有粉碎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才能战胜资产阶级的反抗，更高地举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旗，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彻底胜利。因此，这场斗争是关系到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大事，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大事，我们必须取得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我们也一定能够取得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政法战线的同志们都应当充分认识这一场斗争的严重意义，自觉地积极地投入斗争，和其他战线上的同志们一起，在党的领导下，彻底粉碎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保卫党的总路线，进一步贯彻党的总路线，并且使自己在这一场斗争中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加强自己的政治锻炼，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的战士。

在党的八中全会决议的指引和鼓舞下，保卫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已经普遍展开并正在向深入发展，并且获得了极大的胜利。同时，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已经掀起反右倾、鼓干劲、增产节约运动的高潮，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一个新的大跃进的高潮正在以磅礴之势向前推进，这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攻的有力回击。现在必须乘胜前进，把这一场斗争坚决进行到底，务求搞深搞透。我们相信，随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必定会出现一个更新的局面。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取得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彻底胜利，一定能够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被
烈
苏
祝

我
社
的
路
会主

路。

路已

当初

组成

各个

新型

派与

“发展

力争

在继

其他

科学

际站

类走

成就

①、

②

③

④

社論

在十月革命的紅旗下胜利前进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由这个革命所創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向被中国劳动人民看作是自己的旗帜、自己創建新国家的榜样。为此，全世界进步人类都在热烈地同声庆祝偉大的十月革命四十二周年的时候，中国人民对于自己的亲密兄弟——偉大的苏联人民，偉大的盟邦及其領導者——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祝賀。

我国人民剛剛欢欣鼓舞地度过了自己的偉大的建国十周年紀念日。在这欢庆的日子里，我国人民热烈欢呼在中国共产党和偉大領袖毛澤东同志领导下所取得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光輝胜利。可是，我国人民深切了解，我們的胜利是与偉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分不开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給我們送来了馬克思列宁主义”^①，“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結論”^②。我們党和我国人民一向把我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看做是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繼續，是光輝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胜利。

偉大的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根本轉折点，开辟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列宁极其中肯，极其令人信服地指出：“重要的是，坚冰已經打破，航路已經开通，道路已經指明”^③。四十二年来，我們看到，这条道路是愈来愈寬广了，愈来愈是景色动人了。当初苏联人民在資本主义包围下，在一国建設社会主义的那种局面，現在已經由以苏联为首組成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各国共同建設社会主义的局面所代替。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各个兄弟国家，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下，創立了与資本主义国际关系性质完全不同的新型的国际关系——兄弟般的互助合作关系，互相支援、互相鼓舞，取得了共同的經濟高涨与文化发展。目前，苏联人民正在胜利地执行着共产主义建設的宏偉綱領——七年計劃，“发展国民經济的七年計劃不仅将能完成，而且将超額完成”^④；我国人民在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光輝照耀下，取得了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正在繼續跃进，争取就在今年，即提前三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标。消息不断傳來，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国民經济都获得了高速度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成就也益发光采夺目；今年苏联連續三次发射宇宙火箭上天，特别是发射自动行星际站的成功，这就向全人类更加有力地表明了：举起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开辟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的人民，現在，仍然是他們，高高地举起了科学技术最新成就的旗帜，开辟着人类走向宇宙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放射

①、②、毛澤东：“論人民民主专政”。

③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8頁。

④ “赫魯曉夫11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宮接見苏联新聞工作者时的講話”，載于195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

的光采，是更加灿烂夺目了。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并将取得最终胜利的最重要的保障。这种团结是坚不可摧的，因为这是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体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看到了最生动最感人的写照。两年前召开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体现了这种联合，团结；两年以来，各国共产党在共同斗争中相互支持，在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方面团结一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更是大大地加强和巩固了。极端敌视这种团结的帝国主义和它的工具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妄图破坏这种团结，当然这是徒劳的。继续痛击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继续向修正主义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努力维护和更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我们的神圣任务。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也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照亮了争取解放的道路，并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旧世界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横行霸道的世界。十月革命对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给予重重的一击，在这方面也打开了缺口，自此以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愈益广泛、深入地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看到，原来就为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新局面而受到激励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更加高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都亲身感觉到：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斗争，始终受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热情支持和巨大鼓舞。帝国主义，特别是它们的魁首美帝国主义，为此感到极大的恐慌。它们正在极力挑拨这些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关系。但一切受过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已经亲身体会到并且深信：十月革命的人们、高举十月革命红旗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他们的最忠实的朋友；他们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亲密团结，互相支援，必将加速、最后地埋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加速他们取得民族解放胜利的进程。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伟大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永远是亲切的。我们把我国革命的胜利看作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兄弟同盟。十年来，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维护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事业的共同斗争中，亲密地团结在一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国人民十分熟悉：我们在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国家的斗争中、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巨大支援，对此，我国人民是衷心铭感的。我们深信，在进一步发展我们共同事业：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我们的友谊必将与日俱增。

自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来，这四十二年，以无数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人类证明了，由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必然的历史趋势，是任何反动力量阻挠不了的。当前的国际局势更加显明：“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腐朽的资本主义旧世界一定要崩溃，人类的新时代肯定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时代。

让我们高举十月革命的红旗胜利前进！

如下

共和国
中国
和国

的内
本质
联合

现在
首的
图永
度的
后，
决議

力，
口加
正是
平定
所支
“西
势和

促进
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联合国大会 十四届會議通过所謂“西藏問題” 的非法決議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联合国大会十四届會議通过所謂“西藏問題”的非法決議的声明

1959年10月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联合国大会討論并且通过所謂“西藏問題”的非法決議，发表声明如下：

最近联合国大会十四届會議非法討論了所謂“西藏問題”，并且通过了一項誣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決議。这是美国政府不顾苏联等許多国家和世界公正輿論的反对，又一次挾持联合国中的多数国家粗暴干涉中国內政、蓄意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罪恶行为。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感到极大的憤慨，并且表示强烈的抗議。

西藏是中国的領土。平定西藏反动分子的叛乱，和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完全是中国的內政，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或任何国际組織都无权过問。联合国宪章明文規定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轄的事項，联合国討論所謂“西藏問題”是根本違反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大会关于所謂“西藏問題”的決議是非法的、无效的。

借口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来进行这种干涉，更是一个絕大的諷刺。誰都知道，直到現在，还在殘酷虐杀黑人的是美国統治階級，不断摧殘广大殖民地人民的人权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他們有什么資格来談論基本人权？至于說到中国的西藏地区，那末，企图永远剥夺西藏絕大多數人民的人权的，正是力图保存西藏黑暗的、殘酷的、野蛮的农奴制度的一小撮西藏叛乱分子。只有在平定了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并且进行了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民才得到了基本人权和信仰宗教的真正自由。联合国大会关于所謂“西藏問題”的決議，是不折不扣的顛倒是非和造謠誣蔑。

最近以来，由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国际局势开始趋向和緩。美国不甘心它的实力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失敗，因此制造各种借口加剧冷战，力图把責任推到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身上。在联合国提出所謂“西藏問題”，正是美国蓄意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一个步驟。誰都知道，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早已平定，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要在西藏恢复帝国主义和外国干涉主义者所支持的农奴主統治，是絕对不容許的，也是絕对办不到的。美国挾持联合国通过关于所謂“西藏問題”的決議，向全世界人民无可爭辯地証明了，蓄意制造紧张局势、力图阻撓国际局势和緩的，不是旁人，正是美国自己。

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則，联合国的首要責任應該是維護国际和平和安全，并且对促进国际友好合作作出貢獻。不幸的是，联合国多次被美国利用为它的侵略和干涉政策服务。現在联合国又一次在美国及其追随者的操纵下，充当了干涉中国內政、制造国际紧张局

势的工具。这只能使联合国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更加下降。同时，应该特别指出，同中国已经建交或者半建交的巴基斯坦、挪威、丹麦和瑞典、英国和荷兰，在表决所谓“西藏问题”列入议程或者通过决议的过程中，采取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极不友好的行动。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不能不表示深切的遗憾。

美国挟持联合国通过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非法决议，又一次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十年以来，美帝国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但是，正如同美国历次的侵略和干涉一样，这一次美国的阴谋也必然要遭到可耻的失败。它既绝对影响不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繁荣幸福大道的前进，也阻挠不了世界各国人民争取继续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

联合国干涉“西藏问题”是非法的

周 鯨 生

联合国大会第十四届会议，在美帝国主义指使和操纵之下，由爱尔兰和马来亚出面提案，通过总务委员会，硬把所谓“西藏问题”列入大会议程，进行讨论，并且不顾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坚决反对以及一些爱好和平的亚非国家的表示不赞成，公然于10月21日通过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这是联合国的舞台和表决机器又一次被美帝国主义利用来进行诬蔑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

美帝国主义的这次阴谋和联合国大会这场丑剧的出现，本来是早在人们意料中的事。自本年3月间西藏叛乱发生，达赖被劫持到印度以后，帝国主义分子和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一直在干涉西藏，大肆叫嚣，极尽其对中国进行造谣和中伤的能事，并且发动国际宣传，展开国际活动，至出现什么“支援西藏人民委员会”一类的反动的政治性的组织，公然要求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由于它一直敌视新中国，蓄意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西藏事件正是它所要利用来兴风作浪的；而一向在它操纵下的联合国，就自然而然地又成为它利用以实现

其阴谋的工具。作为世界组织的联合国大会这次又甘受美国操纵，居然就所谓“西藏问题”，根据爱尔兰、马来亚的提案，通过一个完全诬蔑中国的决议，是不可宽恕的。

第十四届联合国大会通过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是根本非法的、无效的，我们对于那种决议是坚决反对的。联合国大会根本无权通过有关中国的任何决议。大会讨论“西藏问题”和通过决议，是侵害中国的权利和尊严。

特别是因为西藏问题涉及中国的内政，而按照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的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项。这就否定了联合国自己干涉一国内政的权利，因而联合国通过大会或其他机关对任何国家的内政事情的干涉就都是破坏宪章，也就是非法的。就所谓“西藏问题”而言，谁也不能否认，西藏向来是中国的领土一部分，在中国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发生叛乱，中国政府平定叛乱，进行民主改革，纯属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政府在这里行使主权；按照宪章第2条第7款，联合国根本无权

过
大
調
究
總
論
對
因
則
如
能
顧
“西
它們
的。
長
當
內
論
為美
是，
不構
涉，
充分
言也
贊成
見。
“西
憲章
憲章
項問
國應
尊重
質言
國憲
家的
則并
討論

过問。如苏联代表庫茲涅佐夫在10月20日大会发言反对把这个問題列入議程时所強調，如果辯論“西藏問題”，这将“严重破坏了宪章，因为宪章禁止干涉任何国家的內政”。总之，把所謂“西藏問題”提出联合国大会討論和通过決議，在联合国为越权行为，构成对宪章的破坏，肯定也是对国际法的違反，因为不干涉內政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如此，有些西方殖民主义的国家，如法国、比利时等作贼心虛，对于联合国可能討論它們的附屬地民族解放問題有很大的顾虑，也不得不伪善地认为討論內政性的“西藏問題”不符合宪章的規定而棄权，虽則它們基本上是同情爱尔兰、馬來亚的提案的。印度尼西亚政府第一部长兼代理外交部长朱安达10月16日在議會中說得很直截了当：“西藏問題純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內政問題，因此，我們不准备在联合国中討論這個問題”。

在联合国大会进行討論中，有一种謬論为美国代表洛奇10月20日发言所主張的是，联大把“西藏問題”列入議程和进行討論不构成宪章第2条第7款所指对內政的干涉，而且根据宪章第10条和第55条，大会充分有权通过決議；英国代表迪克逊21日发言也认为进行討論是正确的，不过他倾向于贊成以通过決議以外的形式表示大会的意見。他們的邏輯好像是认为大会討論所謂“西藏問題”以至通过決議都不算違反联合国宪章，因为宪章第10条規定，大会得討論本宪章範圍內之任何問題或事項，并得提出各項問題或事項之建議；而第55条規定，联合国应促进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別、語言或宗教。质言之，即按照美帝国主义者說法，联合国宪章尽管有第2条第7款否定干涉任何国家的內政，但是大会仅仅討論和通过決議，則并不构成干涉，因为大会根据第10条有权討論任何屬於宪章範圍內的問題和事項，而

促进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又是第55条所規定的事項。必須指出，这种說法是再荒謬不过的了。首先，这只是代表一种形式主义的机械式的对干涉的認識，即认为干涉必須是出以暴力或威胁的措施；而这种認識是完全不符合現代国际关系的实际情况的。現代国际关系上特别是帝国主义者对他国进行的干涉具有多种多样的方式，而施加政治的压力就是其中一种很严重的干涉方式。在联合国大会这一国际組織的會議上对一国的內政問題进行討論，通过決議，显然是在企图施加重大的政治压力，还能說不是干涉嗎？其次，这种看法也根本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宪章第2条第7款禁止干涉內政，开宗明义地列在联合国組織的原則条款，同第2条第1款所強調的主权平等原則是相关連的。这意味着不干涉內政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必須严格遵守，而不是可以容許用后面其他条款来抵消或削弱的；并且，对于必要的例外，也已經就在第2条第7款下特別作了規定（即：“但此項原則不妨碍第7章內执行办法之适用”）。因此，用宪章第10条和第55条来对抗第2条第7款显然是对宪章的歪曲的解釋，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第三，按照联合国宪章第10条的規定，大会的职权是討論問題和事項，通过建議；而采取具体措施，特别是执行措施，則是安理会的权限。如果說討論和通过決議都不构成干涉，那末，就大会來說，根本說不上有什么干涉之事，然而这是同事实不符合的。在實踐上，許多重要国际性問題提出大会討論，而西方国家认为联合国干涉。例如往年南非印度間关于南非对印度人种族歧視的問題在提出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南非政府就认为那是對南非內政的干涉，虽則那項問題实质上已經超出國內管轄事件的範圍。由此可見，联合国大会討論所謂“西藏問題”并且通过決議，肯定是构成对中国內政的干涉，因而違反宪章第2条第7款。就是如英国代表所

主張，大会只进行討論，表示意見，而不采取通过決議的形式，也还是干涉；尽管有的英国法学家认为大会討論和建議不构成第2条第7款所指的干涉，那种看法，也是沒有法律的根据的。

联合国大会根据爱尔兰、馬來亞的提案而通过的決議的内容，又是完全歪曲事实的，是对中国的誹謗。这个決議說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已被强行剥夺”，要求“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他們的独特的文化和宗教生活”。試問誰强行剥夺了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是新中国的中央政府呢？还是西藏地方的少数上层剝削階級呢？如本年5月6日我国的人民日报所載“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学”一文所指出，“西藏社会是一个領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在西藏，主要的生产資料——全部土地和絕大部分牲畜，都屬於三种領主，也就是农奴主，即官家(封建政府)、寺院和貴族。这三种农奴主只占西藏一百二十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五左右，即六万人左右。所有的农民都沒有自己的土地，大部分牧民都沒有自己的牲畜，只能为农奴主劳动。”人們不难想到，在这样一种社会經濟制度之下，原来西藏的广大人民能够有什么基本人权和自由！事实是，西藏社会长期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絕大多数人民受尽了各种农奴主的压制、剝削、奴役和殘酷待遇。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地方人民才开始有了光明的前途。我們的中央政府照顾西藏的民族特殊情况，特別設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准备逐步实施民主改革，改变西藏社会的落后状态，消灭农奴主剝削制度，也就是为西藏地方的广大人民爭取基本人权和自由。而拼命反对和阻撓改革，发动叛乱的，正是那些一向剥夺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而至今犹想保持封建特权，不願意他們有人权自由的各種农奴主，即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自西藏叛乱迅速被打平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中央領導之下，着着

进行民主改革，西藏地方已开始具有新面貌，而联合国大会还通过什么決議，对中国要求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那岂不是无的放矢？

其实那些在大会投票通过所謂“西藏問題”的提案的国家，实际并不是为西藏地方的广大人民要求人权自由，而实在是为西藏少数的大农奴主爭取回特权地位，而把广大人民抛回被压迫、剝削、奴役和虐待的农奴悲惨境地。这岂不是要把一个正向光明道路前进的社会又拉回黑暗世界嗎？基本人权和自由本来应当是一切和平进步人类爭取普遍实现的东西，可是帝国主义者到处把人权当做他們的专卖品，其实他們是最不尊重人权的，对殖民地附屬地不待說，就是在他們的本国，如美国对一两千萬的黑人的歧視和虐待，才真正是不顾人权。他們只是利用人权作为幌子，来对抗或削減其它国家的主权，干涉他国内政。至于西藏的文化和宗教，在我們的宪法中本来就有充分保障。宪法規定照顾民族文化的特点，并且規定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的建設事业。宪法保証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事实上中央政府从不干涉西藏人民的宗教生活，我們所要改革的是以寺院作为农奴主的特权和剝削制度。联合国大会的決議要求尊重所謂西藏独特的宗教生活，实际就是要我們回复西藏寺院农奴主的野蛮的非宗教的特权制度。这种要求真是太荒唐了。

关于所謂“西藏問題”，作为爱尔兰、馬來亞提案的根据，公然提到联合国大会的材料，說是有“达賴喇嘛的声明”和所謂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一个題为“西藏問題与法治”的报告。而这两項材料，作为法律的証据，是完全沒有价值的。就达賴的声明而言，美国代表洛奇在大会发言中提到达賴4月18日在提斯浦尔和6月20日在穆索里对記者的談話以及8月30日和9月9日的声明等。其实达賴就是被西藏上层叛乱分子劫持到国外

的，
变本
信
否
者
社
如
日
提
准
报
一
毒
日
嘛
其
員
說
嗎
向
和
制
关
气
力
国
主
“西
謂
报
进
行
該
报
料
完
是
荒
出
走
达
賴
絕
种

的，这种被劫持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因之，所谓达赖声明根本不足置信。甚至他的声明的内容可以马上被事实所否定。例如他在穆索里8月1日回答缅甸记者的话，竟说班禅“不是一个自由人”（新华社仰光6日电），而恰恰最近班禅到了北京；如罗马尼亚代表在总务委员会发言（10月9日）所指出，“这件事证明了爱尔兰和马来亚提出它们的议程所根据的达赖喇嘛的报告的正确性。”至于说到所谓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报告，那是太滑稽了。然而帝国主义者却用这一特别制造的报告作法宝，来对中国进行恶毒诬蔑。美国代表洛奇在大会发言（10月20日）特别强调，“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达赖喇嘛所说的任何一件事情。但是这个悲剧还有其他的见证人。其中著名的是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美国代表竟把所谓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说成是西藏问题的“见证人”，不是太离奇吗？如所周知，这个所谓法学家委员会，一向被看做美英帝国主义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而设的一个御用法学机关。曾经在匈牙利事件后为帝国主义者大卖气力，也发表了一个报告。这次为了帮助帝国主义干涉西藏，该委员会就提出了题为“西藏问题与法治”的报告，其实委员会的所谓报告只是委托一个印度律师作成的，他连进行调查的方法和程序如何也不明白。看了该报告的内容，人们就知道报告所根据的材料完全是歪曲事实的，诬蔑性的，因而论断是荒谬的，毫无根据的。例如西藏叛乱和达赖出走的说法，全是根据一个参加叛乱，劫持达赖的反动分子的陈述写成的。关于所谓灭绝种族的说法更是荒谬绝伦。报告牵强附会

地引用1948年所谓防止及惩治危害种族罪公约，而说中国违犯了其中的（甲）款（杀害团体之分子）和（戊）款（勒令某一团体之儿童转至另一团体）。这种指控完全出于诬蔑，并没有正确的事实来证明。甚至把送西藏青年到北京入学校，说成是“强迫男女青年前往中国，使其丧失民族本性”，而构成危害种族的一个例证，那也真是太荒谬，不值得一驳的了。国际法学家委员会这个报告，如国际民主法协执行局（10月4日—6日）的决议所指斥，是“歪曲法律和事实，以致使用法律术语来为残暴的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进行辩护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这如何能作为提案的根据？

大家都能回忆，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帝国主义者曾经一次策动联合国干涉，而结果丝毫没能动摇匈牙利的合法政府，徒然使联合国自身的威信受到损失。这次对于西藏问题，美帝国主义又挟持联合国演一套丑剧，肯定必然遭到同样可耻的失败而使得联合国这一组织更加威信扫地。美帝国主义也应该知道联合国非法干涉西藏问题不会有结果，而为了继续冷战，阻挠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它也就再一次利用联合国作为干涉中国内政、毒化国际气氛的工具。

但是，如我国政府（10月23日）发表的“关于联合国大会十四届会议通过所谓‘西藏问题’的非法决议的声明”所说，这一次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既绝对影响不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繁荣幸福大道的前进，也阻挠不了世界各国人民争取继续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

反对美国借口维护人权和自由 来干涉我国内政

傳 鑄

在美帝国主义一手策划和操纵之下，第十四届联合国大会竟不顾苏联等许多国家和世界公正輿論的反对，不顾联合国宪章禁止干涉各国内政的明确规定，公然通过了所謂“西藏問題”的非法決議。这是美国导演的一幕彻头彻尾的“冷战”丑剧，是美国蹂躪联合国宪章的又一次可耻的记录，是美国又一次利用联合国組織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毒化国际紧张局势的罪恶行为。

西藏是中国神圣領土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对西藏的一小撮叛乱分子进行镇压，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純屬中国内政，美国和其他任何外国或任何国际組織都无权过問。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明文規定：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轄之事件。因此，联合国討論所謂“西藏問題”和它所作出的決議是非法的、无效的。今年10月4—6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执行局會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問題的決議，严厉譴責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并且指出：“任何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的企图为違反国际法的行为，并且认为那些主張維持这样的制度的法律工作者是在用他們的法律知識来服务于非法状态并且试图为非法干涉中国内政制造‘法律’根据”。

美帝国主义以所謂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等借口，完全是无耻的誣蔑和捏造。

众所周知，西藏过去乃是一个极端落后的、野蛮殘酷的农奴社会，对广大的西藏劳动人民来讲，根本談不到什么基本人权和自

由，他們只有在农奴主土地上被迫劳动的自由；他們只有被农奴主殘酷剝削的自由；他們只有被农奴主鞭打、剜眼、割鼻等各种駭人听聞的殘杀的自由。因此，对这样一个反动落后的农奴制的社会进行改革，对一小撮叛乱分子进行镇压，从而使广大西藏劳动人民出于水火，这正是維護西藏人民真正的人权，使他們享有真正的自由。至于美帝国主义及其僕从們所謂“关心”西藏人民的“人权”和“自由”，却完全与此相反。他們关心的乃是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的人权，企图恢复和保持他們剝削、奴役、殘杀广大西藏劳动人民的自由。关于这点，美国統治者也并不否认，美国助理国务卿威尔科克斯10月18日公开宣称美国希望联合国的討論有助于使西藏“保持他們的生活方式的努力”“繼續下去”。美国駐联合国代表洛奇10月20日在联大会議上更露骨地公开表示，美国政府“全心全意地”支持西藏叛乱集团，支持西藏的农奴主。这些都最清楚不过地說明了美帝国主义所高唱的“人权”、“自由”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于把自己打扮成为尊重人权和自由的“善士們”，人們有理由要問，当西藏广大劳动人民被一小撮叛乱分子殘杀、拷打的时候，你們为何連一声气也沒有吭？而唯有当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起来平息叛乱，进行民主改革，让广大西藏人民真正享有了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时候，唯有当广大西藏人民开始走上了繁荣幸福道路的时候，你們却抬出“人权”、“自由”招牌来呢？你們企图借

“人权”、“自由”为幌子来干涉我国内政，掀起反华运动，毒化国际气氛，制造新的紧张局势的居心难道不是昭然若揭吗？

其实，人权和自由只有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才真正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垄断资本家的利益，为了最大限度的利润，使劳动人民受尽其压榨和剥削，不可能有什么人权和自由，这些国家的法律，也只是为了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利益服务，广大劳动人民的人权和自由根本没有任何保障。例如，美国公民权利法案通过已有八十四年历史了，但罗森堡夫妇无辜被处死，对他们人权自由的保障在那里呢？美国共产党及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美国进步人士经常受到无端的迫害、逮捕、监禁，他们的人权、自由是根本得不到保障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美国至今仍实行着种族隔离制度，在旅馆、戏院等公共场所里，白人与黑人都得分开，一切白人区的电灯、自来水和煤气都不准黑人使用。不仅如此，美国统治者根据所谓“有色人种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比白种人低劣”的谬论，白人可以无故杀害黑人，例如，1958年8月27日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的十七岁黑人青年福斯特被警察平白打死，据说他曾电话里“污辱”了一个白人妇女。仅据“美国公谊服务会”等三个组织的联合报告，从1955年1月1日到1959年1月1日，美国南部发生的杀人、殴打、爆炸和聚众袭击的种族迫害事件就有三百五十起之多。这些都是有根有据的事实，如果美帝国主义真正关心人权的话，那么对上述的那些事实应作如何解释呢？美国公民——黑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为何没有得到保障呢？恬不知耻地借口尊重西藏人民基本人权和自由

来进行干涉，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在国际事务上，借口“人权”、“自由”来进行干涉他国内政、诬蔑社会主义国家亦是美帝国主义的惯技。单在联合国范围内，这类事情已有不少。1948年美国等向联合国所提出的匈牙利对进行叛国活动的明曾蒂红衣主教和保加利亚对进行叛国活动的教士的审讯，说是“破坏宗教自由，侵犯人权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提案便是一例。1953年由美国向第八届联大提出的所谓苏联存在着“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的提案也是一例。1954年我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美国指使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向第九届联大提出了一个文件，诬蔑我国实行“强迫劳动”又是一例。事实上，上述提案全系用凭空捏造来进行诽谤。社会主义国家一贯为维护人权进行不懈的斗争，苏联在制定联合国宪章过程中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以及历次在联大讨论违反人权问题所持的立场，都足以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权问题的态度。因此，美帝国主义的那些诬蔑不攻自破，早被事实所粉碎。但从这些事例中却正好证明美帝国主义是惯于打着“人权”、“自由”的幌子，而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借口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来进行这种干涉，只能证明了美帝国主义“贼喊捉贼”的伎俩而已，只能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只能更加激起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的义愤。像以前一样，这一次美国所制造的阴谋也必然要遭到可耻的失败。它既绝对影响不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繁荣幸福大道的前进，也阻挠不了世界各国人民争取继续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执行局会议

(1959年10月4日—6日于北京)

关于中国西藏地方问题的决议

执行局

考虑到西藏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个事实从未被任何国家的政府所否认；

考虑到某些时候由于外国的侵略性的和非法的行为，中国在行使主权方面受到一定的阻害，而这种行为决不能造成合法局面，因为非法行为是不能造成合法局面的 (EX INIURIA IUX NON ORITUR)；

考虑到由于历史环境，中国西藏地方仍然极端落后，保持了残酷的农奴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的权利和自由完全被蔑视，广大农奴群众被剥夺了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权利；

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进行的民主改革的实现将会提高中国西藏地方人民的生活程度和文化水平，促进西藏民族的发展和繁荣，这种政策是符合于现代国际法的要

求的；

注意到有些别有用心的法律工作者（如设在日内瓦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竟不顾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无视国际法，破坏基本权利和自由，甚至犯了灭绝种族罪；这是歪曲法律和事实，以致使用法律术语来为残暴的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进行辩护达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这些做法是与他们法律工作者的称号不相称的；

认为任何在“法律”的幌子下保护残酷的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企图乃是一种野蛮的行为；

谴责任何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的企图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且认为那些主张维持这样的制度的法律工作者是在用他们的法律知识来服务于非法状态并且试图为非法干涉中国内政制造“法律”根据。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通报

布鲁塞尔 1959 年 9 月 2 日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和总书记曾致电 9 月 1 日至 5 日在贝鲁特举行的阿拉伯律师大会，电文如下：

“值此大会召开之际，我们向你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我们获悉几位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法律工作者被非法监禁、隔离并受折磨，为此表示深切不安。如果你们能获得这方面情况，并且运用我们共同的原则，即尊重民主自由并且为争取被帝国主义所征服的各国人民的独立，保持一致行动，而进行过问，我们将十分感激。”

总书记：乔尔·诺尔曼

主席：丹·诺·普里特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在北京 举行执行局会议

本刊記者

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应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邀请，于今年九月派遣代表团来我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典礼，同时它在北京召开了执行局会议。会议于十月四日至六日举行，由国际民主法协主席丹·诺·普里特主持。

出席会议的代表包括以普里特为首的执行局绝大多数成员以及若干国家的法律工作者代表，他们是：国际民主法协主席普里特，国际民主法协副主席、苏联全苏法律研究所科学委员会委员库德利雅夫采夫，国际民主法协副主席、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沈钧儒，国际民主法协副主席、日本和平委员会理事长平野义太郎，国际民主法协副主席、巴西法律工作者协会会长费埃洛；国际民主法协总书记诺尔曼；国际民主法协书记处书记：匈牙利法律工作者协会总书记贝尼德克，布拉格大学法学教授比斯特里斯基；苏联代表、全苏法律研究所所长戈尔谢宁，中国代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吴德峰、张志让和书记处书记姚仲明，波兰代表、波兰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马祖尔，印度代表、全印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委员拉蒂菲；英国律师盖斯特，国际民主法协财务长德岡，以及国际民主法协执行书记爱露西夫人。

沈钧儒在会上致开幕词，对国际民主法协代表团来我国参加国庆盛典并在北京举行国际民主法协执行局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国际民主法协自成立以来在法律为和平服务、保卫基本人权、反对帝国主义和殖

民主义的正义斗争中所作出的有价值的贡献，表示赞扬；并且表示深信：“法律为和平服务”这一庄严的事业将获得更加光辉的发展，而国际民主法协也将会日益壮大。

在会议过程中，代表们分成四个小组，就当前世界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从法律方面广泛地交换了意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通过了“关于殖民主义的决议”，“关于公民自由受到威胁的宣言”，“关于老挝的决议”，“关于中国西藏地方问题的决议”，“关于裁军的决议”，“关于曼诺利斯·格列索斯的决议”，“关于赫卢的决议”，“关于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会谈的声明”，“关于日本的决议”。

“关于殖民主义的决议”指出，殖民主义是一个必须迅速根除的时代的祸害。决议说：“今日，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更多的人了解到殖民主义的不公道，和开展民族独立斗争的正义性，但是殖民国家力图用它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武器，不仅维持而且发展殖民制度。它们这样做，严重地损害了各国人民享有独立的民族生活的权利，并且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造成障碍。”决议号召进步的法律工作者在需要进行上述斗争的任何地方，特别是在殖民主义者本国，把法律工作者组织起来，为结束殖民主义的压迫而斗争。

“关于公民自由受到威胁的宣言”认为，侵犯公民自由是反动派的军火库中的第一件武器，常被用来为侵略开路并且危害和平。宣言分析了在某些国家内侵犯公民自由，特

別是侵犯言論、集会、結社和人身自由的日趋严重的情况，列举了有些国家侵犯公民自由的事例，其中包括美国对工会会员、共产党人和共产党进行直接的攻击以及对黑人的歧视，西德政府对德国和平理事会等民主和进步团体进行攻击并且继续取缔共产党。宣言要求全世界法律工作者注视这种继续存在的严重局势，并且请他们合作起来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以保护和重申那些符合于现代国际法准则的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

会议就当前的老撾问题作出了决议，在“关于老撾的决议”中执行局表示对老撾的局势十分关切。决议强调指出，根据日内瓦协议和国际法原则，联合国讨论老撾问题本身以及设立调查委员会是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决议说：“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执行局要求联合国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撤回联合国调查委员会，同时并要求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和老撾混合委员会和国际监察监督委员会的成员立即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处理老撾问题，以便恢复老撾的和平和消除现存的紧张局势；要求立即从老撾撤出全部美国军事人员，停止供应军备弹药并撤出全部储存，以及撤除和放弃所有的新的军事基地；呼吁老撾王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因政治见解或活动而被捕的老撾爱国战线运动的人士。”

“关于裁军的决议”表示“衷心欢迎与支持一切关于裁军的建议，特别是赫鲁晓夫向联合国提出的苏联关于彻底裁军的新建议，这个建议包括取消国外的军事基地，并把立即停止原子武器试验作为第一步，这个步骤会保证世界上的持久和平，并且将在人类历史上展开一个新的时期”。

执行局会议对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心的希腊民族英雄格列索斯案件和黎巴嫩人民战士赫卢的命运表示关切，并分别通过了决议。“关于曼诺利斯·格列索斯的决议”指出：“希

腊军事法庭显然缺乏证据证实对他们指控的间谍罪，并且违背了对待被告应该公平和正义的一切原则，企图威胁反对派和镇压希腊的言论自由。”决议还说：“执行局宣告必须撤销对格列索斯和其他共同被告所作的不公正的判决，它促请世界各地的法律工作者继续努力争取使他们获得释放”。“关于赫卢的决议”要求阿联当局彻底调查大马士革警察局和其他方面的行动，并且立即释放赫卢。

“关于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会谈的声明”对苏美两国政府首脑的会见表示热烈的欢迎。声明认为，会谈及其结果对消除冷战和恢复关于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的国际法，起了积极的作用。声明还认为，由于会谈而出現的局势的缓和，也为世界各国的各界人士更广泛的接触以及在他們之間进行更多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打开了门户。

“关于日本的决议”对日本人民，包括日本法律界在内，反对日美“安全条约”和反对在日本设立军事基地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表示欢迎和支持。决议指出，美国为进一步奴役日本人民，勾结日本政府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企图，是危害日本人民的生存，并且将使他們陷入更大的灾难中去，包括战争的可能性在内，并且将进一步危害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决议还强烈谴责正在策划制订中的刑事法规，这个法规用死刑来威胁为反对把冲绳岛作为美国军事基地和争取把这片领土重归日本而进行斗争的冲绳岛人民。

执行局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国际民主法协本身的工作问题，通过了“关于（‘现代法律评论’）杂志的决议”（“现代法律评论”是国际民主法协的机关刊物），并且决定国际民主法协第七届大会将于1960年在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举行。

(1959年11月15日)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声明

——抗議老撾当局非法迫害老撾爱国战綫党领导人——

(1959年10月28日)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和中国全体法律工作者对于老撾薩納尼空政府非法逮捕老撾爱国战綫党領袖苏发努馮亲王和其他七位领导人，并捏造罪名准备进行非法的审讯，企图对他们施行种种残酷的迫害，表示深为憤慨。

薩納尼空政府逮捕和审讯苏发努馮亲王及爱国战綫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行为，完全是非法的。这是薩納尼空集团执行美帝国主义旨意，疯狂地迫害老撾爱国民主力量、彻底破坏日内瓦協議和万象協議的新罪行，企图进一步使老撾淪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国地位。日内瓦協議和万象協議是維護老撾和平、統一、独立、民主和中立的法律基础。日内瓦協議和万象協議都曾在有关文件和条款中多次明文規定：老撾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証全体公民参加国家的共同生活，禁止对寮国战斗部队和前抗战人員采取报复和歧視。万象協議中最后联合公报、几次联合声明和双方政治代表团協議第一节都明白地确认老撾爱国战綫党的合法地位与权利，并規定在老撾成立有寮国战斗部队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老撾杰出的民族領袖苏发努馮亲王和爱国战綫党历来是反对帝国主义，爭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維護老撾的統一与和平中立的，因此他們得到老撾人民热烈拥护和真誠的爱戴与信任。根据以上各种規定和人民的意志，于1958年5月4日老撾举行的补充选举中，苏发努馮亲王和这次被逮捕的爱国战綫党的几位其他領導者，一道当选为老撾的国會議員。薩納尼空集团甘心作美帝国主义的僕从，不惜拋棄老撾的独立民主，破坏老撾的和平、統

一与中立，竟公然違反人民的意志、背叛民族的利益，非法逮捕苏发努馮亲王和爱国战綫党的七位领导人，并企图以莫須有的罪名送交法庭施行迫害，这是极粗暴地破坏有关国家应当共同遵守的日内瓦協議和老撾一切人都应共同遵守的万象協議的行为，因而是极端非法的；并且野蛮地踐踏了民主自由原則，蹂躪基本人权和侵犯了作为国會議員的合法政治权利与尊严。对于薩納尼空集团所犯的这种罪行，万象協議是明文制止和規定了应有的制裁的。双方政治代表团協議第六条規定：对于寮国战斗部队和前抗战人員采取歧視和报复的行为，無論是誣蔑、逮捕或其他違反協議的行为，将作为“分裂国家、破坏祖国統一、侵犯民主自由和人民的公民权利而加以通緝”，并規定：“如果上述行为侵犯人身和生命，罪犯将依王国現行刑法判决。”由此可見，应当受到审判和法律制裁的，正是薩納尼空集团和它的主使者——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

美帝国主义指使薩納尼空集团非法地迫害苏发努馮亲王和爱国战綫党的其他领导人，其目的是将老撾納入美帝国主义的軍事集团，实行其在远东进行战争侵略的政策，这不仅破坏了印度支那的和平，而且严重地威胁了远东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和中国全体法律工作者为了維護日内瓦協議得到遵守和貫徹执行，为了保卫和平、申張正义、捍卫人权，严正地譴責美帝国主义破坏日内瓦協議及其非法地利用联合国名义放肆地干涉老撾內政

的侵略行为，并抗議薩納尼空集团迫害爱国民主力量的非法行为，要求立即釋放苏发努馮亲王和爱国战綫党其他七位领导人，恢复他們的自由，撤銷對他們将进行非法审判的决定，以在日内瓦協議和万象協議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老撾目前的问题。中国

政治法律学会和中国全体法律工作者向世界上的一切正直的法律工作者呼吁，共同采取一切可能的有效的方式，坚决制止美帝国主义及薩納尼空集团破坏和平、蹂躪基本人权、向民主自由猖狂进攻的罪行，并使无辜的爱国者不受非法的迫害。

老撾緊張局勢是美、薩集团一手造成的

孙 承 谷

近几个月来，老撾的培·薩納尼空政府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公然宣布廢棄1954年的日内瓦協議，重新挑起了內战，最近更宣布对苏发努馮亲王等老撾爱国战綫党領袖进行非法“审判”，企图借此进一步迫害老撾爱国力量，并堵塞恢复和平的道路。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又盗用了联合国的旗帜，加紧对老撾进行干涉，阴谋彻底撕毀日内瓦協議，扩大老撾的战火。因而老撾的局勢正日趋緊張和恶化。它已經构成了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1954年7月达成的日内瓦協議是老撾以至整个印度支那和平与安全的基础，是老撾和印度支那各国独立和主权的国际保証。日内瓦協議結束了印度支那战争，恢复了和平，进一步緩和了亚洲和世界的緊張局勢。日内瓦協議中的“日内瓦會議最后宣言”“关于在老撾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以及老撾王国政府在會議期間所作的兩項声明，不仅为在老撾停止敌对行动和恢复和平作出了决定，并且明确规定老撾走上独立、統一与和平中立道路的具体措施。根据日内瓦協議，老撾政府承担义务严守和平中立，不得参加侵略性的軍事同盟；不容許在老撾建立新的軍事基地，不容許老撾領土被利用来为恢复敌对行动和侵略政策服务；在停战后老撾不得运入外国

軍隊、軍事人員及武器彈药；老撾全体公民得参加全国共同生活，禁止对前抗战人員报复和歧視，并保障其民主自由。日内瓦會議最后宣言还庄严宣布會議参加国負有义务不干涉老撾內政；并决定設立国际委员会負責監察和监督日内瓦協議在老撾的实施。在日内瓦協議生效后，老撾的爱国民主力量經過长期不懈的努力，終于冲破了受美帝国主义唆使的反动势力的阻撓和破坏，实现了停战。寮国战斗部队和以梭发那·富馬为首的老撾王国政府先后于1956年8月至1957年11月在万象达成一系列的協議。在这些協議中，双方按照日内瓦協議的規定和精神宣布老撾人民享有一切民主自由权利；保証不对寮国战斗部队和抗战人員歧視和报复；老撾爱国战綫党等寮国战斗部队方面的政治組織享有合法地位；在丰沙里和桑怒两省的战斗部队参加王国政府后，組織有寮国战斗部队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增加国会議席并举行有寮国战斗部队和前抗战人員参加的补充选举等等。双方还在協議中表示希望国际委员会繼續給予全力帮助，直到根据日内瓦會議的精神使这一切問題都得到解决的时候为止。1957年11月19日，根据万象協議成立了有寮国战斗部队人員参加的联合政府。尽管在彻底实施日内瓦協議和万象協議方面还有待

于繼續努力，然而老撾終究初步實現了和平和統一。由此可見，日內瓦協議在尊重老撾獨立和統一、保障其和平中立地位的基礎上對老撾問題所作的規定，是完全符合老撾民族利益的。它是解決老撾問題和維護印度支那和平的唯一法律基礎。而老撾雙方簽訂的萬象協議則使日內瓦協議中的某些規定更具體化，並且對這些規定作了重要的補充。它構成老撾貫徹執行日內瓦協議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如果老撾王國政府能夠忠實地保證這些協議的完全實施，那末老撾的民族獨立必將日益鞏固，全國人民就能團結一致，在和平和穩定的環境中來建設自己的國家。同時，也有利於維護整個印度支那以及亞洲的持久和平。

但是，在實現老撾的和平統一和執行日內瓦協議問題上從來就存在着兩條道路的鬥爭：一方面是老撾的愛國力量以及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力量為實施日內瓦協議而堅持不懈地展開鬥爭，另一方面便是美帝國主義和在它扶持下的老撾親美右派勢力對於日內瓦協議的蓄意違反和破壞。在美帝國主義的戰爭計劃中，老撾是進攻越南民主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跳板，是亞洲的反共堡壘之一。它當然不願意老撾走上獨立統一與和平中立的道路。早在1950年，美帝國主義就打算插手干涉印度支那的民族獨立運動。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它又曾竭力阻撓會議達成協議。美國拒絕參加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就是它居心不良的鐵證。儘管它當時為掩人耳目不得不假意發表單方面的聲明，表示美國政府不用威脅或武力去妨害協議的實施，而事實上美帝國主義一直對老撾進行着窮凶極惡的政治干涉和軍事干涉。日內瓦會議甫結束，美國就拼湊了侵略性的東南亞條約組織，並公然將老撾的領土規定為這個條約組織的“適用地區”。幾年來，美帝國主義力圖把老撾拖入這個臭名昭彰的軍事侵略集團，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美國还把大批軍事物資和

軍事人員運進老撾，以控制老撾的軍隊和軍事基地，並且不斷對主張老撾和平統一的富馬內閣施加壓力，使富馬政府同寮國戰鬥部隊的和平談判先後七次陷於中斷。1957年11月，有寮國戰鬥部隊代表參加的聯合政府成立後，美國更視之為眼中釘，它竭力製造老撾經濟的困難，同時糾集老撾的親美右派勢力進行反扑，終於在1958年7月迫使富馬內閣辭職、而代之以親美賣國的培·薩納尼空政府。薩納尼空集團上台後立即將老撾愛國戰綫黨代表排斥出內閣，組成了清一色的親美賣國政府。薩納尼空政府對內剝奪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並對老撾愛國力量進行殘酷的報復和鎮壓，對外拋棄和平中立政策，和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吳庭艷、蔣介石等勾結，力圖把老撾納入美國在東南亞的侵略體系。它一方面不斷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軍事挑釁，製造邊境事件，而卻大肆宣揚，反誣越南民主共和國“侵略”老撾；另一方面，薩納尼空首相親自出馬，於今年2月11日聲明不再受日內瓦協議的“約束”，其目的即在於為完全投靠美帝國主義、加入東南亞軍事侵略集團掃清道路。美國國務院在薩納尼空發表聲明的第二天就興高采烈地加以支持，並公然認為從此美國可以“自由地”在老撾設立軍事使團；也將使老撾可以“自由地參加東南亞條約組織”。這就清楚地表明了問題的真相。

薩納尼空在聲明片面廢棄日內瓦協議時根本找不到什麼像樣的“理由”。所謂老撾“已經完成了履行日內瓦協議的責任”，老撾“是一個獨立和有主權的國家”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事實上，薩納尼空集團執政以來對前寮國戰鬥部隊人員和老撾愛國民主人士的野蛮迫害的行為，就完全違反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第9條“不得對戰時曾以任何方式與對方合作的人員或其家屬加以個別或集体的報復”的規定，以及老撾王國政府在日內瓦會議的聲明中所作的保證，即“決心採取有效

措施，俾使全体公民不受任何歧视地团结在全国共同生活中，并保证他们享受王国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和自由”。薩納尼空政府接受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和新武器，接納美国的大批军事人员，允许美国在老撾境内修筑战略公路和飞机场以及建立军事基地等等，更是明白地同日内瓦协议的规定背道而驰。有那一点能说明老撾“已经完成了履行日内瓦协议的责任”呢？至于说老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就可以成为不履行协议的“理由”了吗？薩納尼空政权唯美国之命是从，已经使老撾的独立和主权受到严重的损害；更何况过去几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正是由于日内瓦协议才使老撾的独立和主权有了保障。因而，背棄日内瓦协议只能使老撾掉入美帝国主义所布置的陷阱，重新遭到被奴役的命运。

为了摆脱国际协议的约束，重新发动内战，薩納尼空政府在宣布廢棄日内瓦协议的同时又表示反对国际委员会在老撾活动。“理由”是“不让任何国家干涉自己的内政”。这也是毫无根据的欺人之谈。国际委员会是根据日内瓦协议的规定设立和进行活动的。“关于在老撾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第25条明文规定：“国际委员会负责监察和监督在老撾停止敌对行动协定各项规定的实施。”可见，国际委员会活动的目的和日内瓦协议所要达到的目的——实现老撾的独立、统一与和平中立——是完全一致的。这根本不是什么对老撾内政的干涉。执行日内瓦协议，保证国际委员会有进行正常工作的条件，这是老撾政府应尽的国际义务，决不能够逃避。至于说到外国的干涉，那么对老撾进行干涉的就是美国帝国主义。这是应该反对的。事实证明，在老撾实现和平统一的过程中，国际委员会曾经作出过有益的贡献。1956年8月5日达成的万象协议中双方特别提到：“双方满意地看到，老撾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曾经积极、努力地帮助双方进行会谈，双方

并希望国际委员会继续给以全力的帮助直到日内瓦协议的精神使这一切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的时候为止”。显然，薩納尼空政府反对日内瓦协议和国际委员会，乃是妄图经过内战与独裁的道路，把老撾完全变为美国的侵略基地与殖民地。事实的发展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薩納尼空政府在片面宣布廢棄日内瓦协议之后，就于5月间企图用武力解除前寮国战斗部队的武装，从而把他们消灭。这一阴谋未能得逞，薩納尼空政府竟悍然挑起了内战。正如前寮国战斗部队第二营在告老撾人民书中所指出：“亲美反动集团造成老撾人打老撾人令人痛心的局面，破坏了我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威胁了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他们必须对自己制造的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美国 and 薩納尼空集团为了掩盖事实真相、逃避罪责，竟又颠倒黑白，捏造了所谓越南民主共和国“侵略”的谎言，并以此为借口，使美国盗用联合国的名义来对老撾问题进行干涉。如所周知，老撾问题与联合国无关，联合国根本无权过问。正是由于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失去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能力，所以有关国家才在联合国外作出了努力，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了协议。当然，保证协议实施的全部责任也由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共同负担，并由国际委员会进行具体的监察和监督工作，与联合国毫不相干。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操纵联合国机构，派出了所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调查老撾局势小组委员会”，去老撾“调查”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对老撾的“侵略”，这是完全非法的行为。但就是这个委员会也不得不承认，不能证明越南对老撾进行了“干涉”和“侵略”。现在，美国正力图在老撾建立联合国常设机构，在联合国的招牌下扩大老撾战火，甚至拉别国下水。在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已经多次成为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美国 and 薩納尼空集团千方百计要避开日内瓦协议和国际委员会，硬要把联合国拉到老撾问题中来，目的是什么不是

已經很清楚了嗎？

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还指使薩納尼空政府以所謂“陰謀叛國”罪對已被非法扣押的蘇發努馮親王等老撾愛國戰綫黨的領導人進行非法“審判”。這不僅是對日內瓦協議、万象協議以及老撾憲法的直接違反，而且勢必堵塞一切通過談判和平解決老撾問題的途徑，使老撾局勢益發不可收拾。因此，它已激起了老撾人民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極大憤怒和堅決反對。

總之，老撾當前的局勢正處於極端嚴重的關頭。老撾愛國戰綫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正確地指出：“當前每個人可以看到我們民

族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擴大內戰，讓美帝國主義和它在東南亞條約組織中的走狗加強對老撾的軍事干涉，破壞日內瓦協議和万象協議，消滅老撾愛祖國、愛和平的力量，以便把我國變成美帝國主義的戰爭基地。這是亡國的、民族滅亡的道路；另一條是為嚴正履行日內瓦協議和万象協議而鬥爭的道路，和平、中立、獨立、民主、民族和睦、統一國家的道路，使老撾民族擺脫戰爭災禍，給人民帶來幸福的道路”。老撾人民的鬥爭是完全符合日內瓦協議和万象協議的，他們在全世界愛好和平和主持公理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下，一定能取得最後勝利。

動 態

四川政法公安學院科學研究簡況

今年上半年，我院師生共八百五十五人分為三個實習隊，到綦江、巴縣、長壽三個縣的人民公社進行實習，在當地黨委的直接領導下，本着工作、勞動、科學研究三結合的原則，積極參加了整社運動、政法工作和生產勞動，並結合工作和勞動開展了社會調查和科學研究。

三個隊共寫出了科學論文十八篇，有關人民公社生產、分配、勞動組織、經營管理和政法工作等方面的專題調查一千一百三十二篇，編寫了一些書，並搜集了一批對教學和科學研究有價值的材料，對我院進一步開展科學研究、加強理論聯繫實際、提高教學質量起了一定作用。

下半年開學後，院黨委加強了對科學研究的領

導，指出必須積極開展科學研究，科學要為教學服務，通過科學研究提高教學質量，科學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目前根據教學和實際工作中存在的理論問題，制定院科學研究計劃，共選題一百三十五題，有的結合當前形勢和黨的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學習進行研究。

為了認真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大力提倡學術問題自由爭論的風氣，本學期將舉行一次全院的學理性討論會，明年上半年舉行一次科學報告會，今年12月份出版一期學報。

（四川政法公安學院科學研究委員會）

1959.11.2.

政法工作要坚持和发扬党的 走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

周 景 芳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遵循着党的总路线所照耀的道路，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十年，在历史上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可是，我们的伟大祖国在这十年中已经取得了无限辉煌的成就和各个战线上的巨大胜利，比起旧中国来，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八月举行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给我们指出了继续前进的道路，发出了动员六亿五千万人民向新的胜利进军的伟大号召。反右倾、鼓干劲，保卫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为贯彻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伟大政治任务，当然也是政法战线上的伟大政治任务。

十年来，政法战线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和其他战线一样，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取得这样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政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坚持和发扬了党的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所以，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回溯我们学习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传统的过程，从理论上概括这些基本经验，是十分必要的。

（一）群众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 根本路线，当然也是政法工 作的根本路线

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工作也都是依靠人民群众。我们始终坚定地信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条基本原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身上的

枷锁，只有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双手来打破，人民的幸福生活，只有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双手来创造。革命和建设，都是党领导的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从这个真理出发，就确定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是我们党的基本的工作方法。几十年来，我们党在一切工作和一切方面都贯彻了党的这条根本路线和运用了这种基本的工作方法，而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继续把这种工作方法有系统地运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从而形成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大跃进的局面。因此完全可以肯定，离开了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不会有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大跃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群众路线，反对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大搞群众运动，并对群众运动指手划脚地多方责难，实质上就是反对党的总路线和大跃进。所以，坚持和发扬党的一切工作走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就是保卫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照耀着和指引着一切工作前进的道路，当然也照耀和指引着政法工作前进的道路。政法工作必须贯彻党的总路线，必须保卫党的总路线，必须为党的总路线服务。因此，政法工作的正确路线是：服从党委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参加生产劳动，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服务。其实质就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始终贯彻群众路线，为总路线服务。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政

法工作更加革命化和更加群众化，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武器。长时期以来，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法律观点同反动的政治法律观点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及群众路线同官僚主义两种作风的斗争，就是主張我們的政法工作革命化与群众化同反对革命化与群众化的斗争。这种斗争，实质上是当前我国国内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政法战线上的反映，是政法战线本身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我們必須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必須取得彻底的完全的胜利。

政法工作是否要大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是否要直接为党所领导的一个接一个的群众运动服务，是我們同政法战线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分歧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反对政法工作大搞群众运动。他們把政法工作和群众运动对立起来，生怕大搞群众运动搞乱了他們之所謂“法治”；他們把政法工作不是看作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的武器而是看作限制群众运动的桎梏。他們反对政法工作大走群众路线，反对实行专门机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反对政法工作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他們认为似乎政法工作只是应该由少数专门工作人员关着大門办公。他們反对政法工作积极主动地去配合群众运动、去为中心工作服务；他們认为似乎政法工作应该站在群众运动圈外，等着工作上門以后坐在玻璃窗內办手續。一句話，他們反对政法工作贯彻群众路线，这是我們坚决反对的。十年来的实践証明，政法战线上的胜利是在党的领导下贯彻群众路线的胜利。为了粉碎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謬論和研究我們的經驗，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我們学习和发揚群众路线傳統的过程。

（二）十年来政法机关学习和发揚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荣傳統

政法机关和整个国家机关一样，是在打

碎旧的反动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旧的反动的东西在我們这里是根本不合法的。但是，我們的机关中，也还有一些旧人員，他們的世界观、政治法律观点和思想作风还没有改造，就必然反映到工作上来，要用这些反动的东西为指导建立或改造我們的政法机关；同时我們的同志中也有极少数搬弄资产阶级的教条，用以指导我們的工作。党、人民群众和我們絕大多数政法干部当然是絕不能允許的。这就展开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法律观点同反动的政治法律观点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及群众路线同官僚主义两种作风的斗争。斗争的結果，当然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法律观点和群众路线的作风取得了胜利。

关于两种政治法律观点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根本性問題，已有許多文章讲过了。我这里主要讲两种作风的斗争，簡述我們如何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学习和发揚群众路线的作风的。

大家知道，这种斗争和学习主要的是在党所领导的历次群众运动中进行的。建国以后，党领导我們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政法干部的思想作风得到了很大的鍛炼和提高。在1952年党领导司法部門展开了目的在于克服司法机关的組織不純、思想不純、作风不純的司法改革运动，接着又展开了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运动。这除純洁司法机关，批判旧法观点外，同时也是批判官僚主义、单纯坐堂問案的衙門作风，和贯彻群众路线办案方法的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批判了許多反动思想（其中也包括政法干部的旧法观点），初步解决了大多数知識分子为谁服务的問題。只有这个問題的解决，才能談到树立群众观点和学习贯彻群众路线的問題。在上述五大运动的过程中，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集中群众的意志制定了几項法律（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

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又回到群众运动中贯彻执行,以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和巩固运动成果。这就很切实地教育了政法干部如何在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司法工作方面贯彻群众路线。

五大运动为三大改造铺平了道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法机关在党的领导下批判了某些干部存在的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法律思想,积极参加和配合了运动,并从而学习了怎样在新的情况下贯彻群众路线。

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胜利后,接着进行了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1957年至1958年开展的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和农村、工厂进行的社会主义大辩论。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照耀下,形成了全民的全面的大跃进。政法机关工作人员和其他战线上的工作人员一样,也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他们运用了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出大字报和订社会主义爱国公约以及大搞安全运动等等贯彻群众路线的新形式,这就丰富了政法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使政法战线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三) 贯彻群众路线的新形式, 群众路线的新发展

我们的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一贯把群众路线作为我们的根本路线,这是始终不变的。但它的形式是发展变化的,由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同,它的形式和特点也就不同,总的趋势是日益发展和日趋完善。

在过去几十年中间,我们党用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用这种方法教育和团结群众对敌进行斗争,并且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创造了各种各

样的方法。在经济战线上解决了谁战胜谁的情况下,就有必要和可能进行以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主的全民整风运动,就在运动中产生了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出大字报等全民大辩论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无论是对于革命问题或者建设问题,无论是对于大是大非或者小是小非,都是适用的。这是进行鸣放和争辩的经常性的武器,它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发展,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新发展。这种新形式较之过去的一切形式更能发动群众的主动性和责任心,由群众直接来揭露矛盾和解决问题,更能群策群力地用各种具体方式直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从而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进展;更能显示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生命力和党的群众路线的无比优越性。但是还必须说明,我们绝不是说过去创造的那些形式都可以不用了,那些形式也是好的,应该多种形式同时并用,这样就更丰富多样、活泼有力,就可以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这种贯彻群众路线的新形式,有什么特点和优点呢?我认为归结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全面彻底地揭露矛盾,找出主要矛盾,为解决矛盾提供必要的前提。我们知道,再没有比群众性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出大字报、开座谈会、辩论会等更能及时、全面、深刻、彻底地揭露矛盾的了。经验证明,只有彻底揭露矛盾才能彻底解决矛盾。以整风的经验为例,如果没有坚决地放、大胆地放、彻底地放,便不容易有坚决地改、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往往有许多问题在不鸣不放、不争不辩的情况下,几乎老是得不到解决;在小鸣小放、小争小辩的情况下,很慢地得到了某些不彻底的解决;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情况下,就很快地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在政法工作方面,有些重大、复杂或疑难的案件,有时拖了很久未能彻底弄清,但经群众揭发、鸣放辩论就迅速弄清了。

这种形式的特点是生动、具体、及时、尖锐；因为是群众性的多方面的意见，综合起来也就比较全面。不但揭露矛盾是群众性的鸣放争辩的过程，而且研究各种矛盾之间的关系，找寻主要矛盾，抓取一系列矛盾长链中的中心环节，也是有领导地进行群众性鸣放争辩的过程。这样才能抓得准和认识一致。全面揭露矛盾和找出主要矛盾，这是解决矛盾的先决条件。第二、通过集思广益、争辩对比就可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法。群众性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仅揭露了矛盾、弄清了问题的真相和产生的根源，而且还能提供多种多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再经过比较研究，就可找到公认的妥善的方法，使问题得到迅速、正确的解决。第三、提高群众的觉悟，为解决问题培养了良好的条件。解决问题需要有一定的主观力量。事总是要人来办的，而且不是依靠少数人所能办得起来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出大字报、开座谈会、辩论会等形式，是最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责任心的一种形式，也是人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和互相教育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有了这种积极的觉悟的、通晓问题情况和解决办法的人民群众，使问题的解决在主观力量方面就有了保证。第四、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仅可以解决具体问题，而且可以改变使问题得以产生、发展的“气候”和“土壤”。我们知道，问题的产生和长期存在甚至发展到严重的程度，除主观上的原因以外，往往同客观环境有关系。如果这些问题克服了，就可以杜绝问题的滋长或扩大，使它及早得到解决。

政法战线学习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传统，以及贯彻群众路线的新形式的发展，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和其他战线一道进行的。但是，群众路线在政法工作中也有其自己的具体表现形式。例如：政法工作人员下乡下厂，深入群众进行调查，在群众帮助下就地侦察、就地起诉、就地审判等，这就是政法

工作实行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经过群众自己订立、自觉遵守的社会主义爱国公约，是群众性的创造，是政法工作实行群众路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政法工作中群众路线的新发展还集中地表现在大搞安全运动上。罗瑞卿副总理指出：安全，这个口号，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和人民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恰当地体现了政法工作努力的目标。安全运动为政法部门工作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结合创立了新的途径，它是政法工作在新形势下贯彻群众路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

在这里，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政法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对于政法工作实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政法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出现在人民群众之中，这就能够彻底有效地扫除官气、暮气、骄气，密切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并从切身的体会中增强了政法工作必须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便于人民群众和依靠人民群众的群众观点。有了明确的群众观点，就为很好的实行群众路线准备了思想基础，使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政法工作能更好地为经济基础服务，大大有利于我国政法工作的革命化和群众化。所以，政法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是我国政法工作的革命性的发展。

（四）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是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

我们政法干部中也有一部分人具有程度不同的右倾思想。这种思想不管其表现形式怎样，他们的共同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相信群众。这种观点是贯彻群众路线的思想障碍。因为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是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没有明确的群众观点就不可能贯彻群众路线。

不相信群众的思想，它的所谓“理由”和表现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虽然有这种思想的人只是少数，但这种思想的危害还是很大

的，所以必須严肃批判。

我們知道，在广大干部和群众鼓足干劲的同时，在一小部分干部中出現了一种畏难泄气的右傾情緒。他們夸大了工作中暫时的困难，忽視或低估了已取得的偉大成績和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他們把某些客觀困难絕對化，看不見主觀能動的改造作用。这是一种值得严重注意的右傾危險。这些人犯这种錯誤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不相信群众，看不見群众的干劲、力量和智慧。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經打倒了三大敌人，取得了五大运动、三大改造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全面大跃进。这种偉大成就如此明显，它甚至已經把我們的敌人惊得目瞪口呆了。已經扭轉了中国的乾坤的人民群众，正以移山倒海之势奔騰前进！在这样的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什么事办不到呢？在任何时候不相信群众都是錯誤的，在今天这种情况下再不相信群众更是毫无理由的，甚至连可作根据的借口也很难找到了。

还有一小部分人，因为不相信群众，老是怕群众搞錯了。他們不是站在群众当中領導群众运动，而是站在群众的对面用一个固定的框子（清規戒律）去限制群众运动。当运动冲破了他們的限制大踏步前进后，他們就站在群众运动的后面指手划脚地批評群众，这种人看不見群众的革命热情和偉大成績，只抓住运动中不可避免发生的一些局部、暫时的缺点，分不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把支流当主流。这种錯誤如果不糾正，是没有不在政治上摔跤子的。历史事实証明，在

党的领导下，历次运动都是健康地发展和取得巨大成就。这种不相信群众的錯誤观点應該扭轉过来了。

我們應該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認真貫徹群众路綫。因为我們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利益以外沒有特殊的利益。因为我們是一切对人民負責，对党、对国家負責与对人民負責是一致的。因为我們知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創造者，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我們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群众路綫的根本出发点，也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出发点。

政法战綫上和其他战綫上一样，当前应集中全力反右傾、鼓干劲，保卫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为貫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決議爭取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繼續跃进而奋斗。因此，政法工作，就必須在党的絕對领导下，和其他战綫很好协作，提高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和創造性，充分發揮人民群众的热情、智慧和力量，以保証全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为了完成这一重要政治任务就必須：領導与群众相結合，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智慧貫徹党的方針政策。总而言之，必須貫徹党的群众路綫。为了在政法工作中彻底貫徹党的群众路綫，就必須坚决同那种反对大走群众路綫和反对大搞群众运动的右傾机会主义思想作坚决的斗争，系統地总结并从理論上概括政法工作走群众路綫的基本經驗，以便更加清醒更加自觉地貫徹党的群众路綫，推进我們的政法工作从跃进到更大的跃进，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論无产階級的自由觀与資产階級的自由觀

協 之

一、两种对立的自由觀

毛澤东同志指出：“在階級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實踐論”）对于自由的了解，也是如此。現在世界上，有两种对立的自由觀：无产階級的与資产階級的，这两个階級关于自由問題的爭論标志着两种世界觀的根本对立，是辯証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斗争的一个組成部分。

形而上学唯心主义顛倒了精神与物质、主觀与客觀的关系，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因而认为个人的意志自由就是摆脱客觀世界的限制、不受客觀規律的約束。

辯証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不是意識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識，当人們能够正确地認識客觀存在时，意識就能够起积极的作用，不然就要在客觀事物面前碰壁。因此，个人的意志自由不能超越客觀必然性的限制，而是对于客觀必然性的認識和利用。恩格斯写道：“自由不是在于想像中的对于自然規律的独立，而是在于認識这些規律，并且在这种認識所給予的可能性之上，有计划地使得自然規律为着一定目的发生作用。关于外部自然的規律，以及关于人們本身的支配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規律，都可以这样說……所以意志的自由，不是別的，只是由于認識事物而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所以自由是以对于自然必然性的認識为根据的、对于我們自己以及对于外部自然界的支配……”（“反杜林論”，

第117頁）。这就是說：人們在沒有認識客觀規律以前，只能盲目地受其支配，这不是自由；認識了客觀必然性并依照它的要求来进行活动，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人对于客觀必然性的認識愈是深刻，愈是全面，人的意志和行动就愈是自由。

这两种对立的自由觀淵源于資产階級与无产階級根本对立的階級地位和階級利益。

資产階級是依靠剝削剩余价值而生存的階級，它要求一切东西，包括劳动力，都能够进行自由买卖，因为这样才能实现它的剝削。所以資产階級高唱自由主义。它所要求的自由，資产階級学者約翰·密尔曾下过一个被資产階級推崇为經典的定义：“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們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們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們不試圖剝夺他人的这种自由，不試圖阻碍他們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論自由”）說得好漂亮，好像是人人都可以按照資本主义的道路去追求自己的好处（資本主义利潤等等），只不过是人人都不能剝夺他人享有这种自由，不能阻碍他人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然而实际上，資产階級所标榜的自由，只是使資产階級能够任意剝削无产階級、掠夺殖民地以发财致富，而不許无产階級反对剝削、摆脱奴役的自由。但是，資本主义制度是不能永世长存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的矛盾的日益尖銳化，必然要归于消灭，从而以这个制度为基础的一切“自由”也必然要随之而灭亡。資产階級当然不愿意也不敢于承认这一点。而且他們是占少数人口的階級，也不敢公开承认他們的自由是以剝削和

奴役大多数人为条件这一真理。既然不敢承认这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客观存在的真理，资产阶级的自由观便不能不是主观与客观相对立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自由观，把个人的意志自由和客观必然性完全对立起来。

无产阶级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集中在大生产中劳动，养成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不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他们只会失去自己颈上的一条锁链，而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因而它能够而且必须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消灭一切剥削和产生剥削的根源——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解放全人类。所以无产阶级要求以服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为目的的自由，要求以集体利益为前提的自由，要求把个人的幸福建立在绝大多数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当然排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任意剥削的自由；同时又必然是服从集体利益，受集体的组织纪律所约束的自由。无产阶级要求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不仅是由于无产阶级的本性如此，而且也在于没有坚强的组织和纪律就不能把千百万劳动群众团结成为一支能够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军，因而就不能解放全人类，也不能解放自己。依靠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本身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才能实现，这对于它才是自由。所以，无产阶级认为自由是对于历史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自由和纪律是统一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由观。

这两种自由观的对立反映着两个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标榜“按照自己的道路去追求自己的好处”而不能阻碍他们走这种道路的“自由”，是为了使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受妨害，同时又使劳动者产生一种幻想，好像在不妨碍他人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前提下，他们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道路取得自己的“好

处”。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既然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无产者就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生活，否则就要饿死，这还有什么自由呢？所以，这种自由对于无产者就是假自由，这种自由观就成为资产阶级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和进行欺骗的手段。无产阶级认为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认识和利用，是按照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要求来进行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以摆脱奴役、剥削和贫困，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自由。这种自由观是科学的自由观，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用来揭露资产阶级并教育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两种对立的自由观在几个问题上的反映

这两种对立的自由观往往表现在各个具体问题的争论上。一切反动派，从帝国主义者到修正主义者，从蒋介石集团到资产阶级右派，都在喋喋不休地诬蔑我们的国家“不自由、不民主”，据说他们还要为人民“争自由、争民主”。让他们去恶毒地诅咒吧！既然他们所要求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由，这种自由在我们这里确实是不存在的，我们这里所有的却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由，那末，他们诅咒得愈凶，就愈证明我们做得对，敌人愈说我们这里“不自由”，就愈证明我们这里有真自由。但是，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还没有摆脱资产阶级自由观的影响，还想要有“随心所欲”，“不受限制”，追求资产阶级的个人的自由。一般说来，他们 also 承认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可是一碰到具体问题，特别是对自己个人有切身利益关系的问题时，就往往搞不通，总觉得受着这种或那种的限制，因而就这样或那样的不自由，好像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哩。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作一番探讨。

1. 有人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容许

反对党活动的自由，甚至还容許共产党合法存在。而我們国家則不容許任何反对党的存在，不容許任何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这样看来，还是資本主义国家比我們国家自由些。”

的确，在資本主义国家里，除了执政党外，有着各色各样的反对党，但实际上只有两种，一是代表无产阶級利益的反对党，它是資产阶級专政的对象；一是統治阶級内部的反对党，即資产阶級的在野党。

所以会有这样的現象，是由于：

(1) 以私有制为基础、互相竞争、互相傾軋的資产阶級内部，必然会随着利益上的矛盾而分成許多派別和集团。在鎮压劳动人民的反抗，巩固資产阶級統治这一点上，它們是一致的；但彼此之間又由于利害冲突而勾心斗角，爭权夺利，这是資产阶級本性所决定的。因此，在資产阶級国家里，不仅有資产阶級的执政党，也有資产阶級的在野党。在野的罵在朝的，在朝的也罵在野的，罵的很熱鬧，这个說那个不行；那个也說这个不行，过一定時間，此上彼下，輪流执政。这对資产阶級來說，不論是为調节其内部矛盾或是为維護其对劳动人民的統治，都是有利的。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在爭权夺利之中让資产阶級各政派都分点好处，以便联合起来对付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可以用这种小罵大帮忙来粉飾資产阶級民主、掩盖資产阶級专政，欺騙劳动人民。在議會里好像实行着十分民主的原則：少数服从多数，实际上，各个資产阶級政党，不管是在朝的、或是在野的，都是代表資本家的利益。輪流执政，是換湯不換药，都是为資产阶級效劳。列宁在1912年11月評論美国两大政党的竞选时写道：“这两个政党的斗争主要是在关稅率高低的问题上。这种斗争对人民群众沒有多大意义。两个資产阶級政党利用它們之間的虛張声势的毫无內容的决斗来欺騙人民，轉移人民对切身利益的注意。”（“列宁全

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97頁）

(2) 对于代表无产阶級利益的反对派，資产阶級国家是不許其有真正的自由的。資产阶級的最如意的算盘是：既有劳动力可供剝削，而劳动者又不进行反抗斗争。但事实上这种如意算盘是打不通的。有被剝削的劳动群众存在，就有劳动者反对剝削者的斗争。資产阶級依靠剝削无产阶級而生存，它不能消灭无产阶級。有无产阶級，就必然会有代表无产阶級利益的政党，就必然会有无产阶級政党领导下的群众斗争。要限制也限制不了，不讓其合法存在，它会“非法存在”，不許其公开活动，它会轉入地下活动，不要它发展，它仍然在日益壮大和发展。而且压制得愈凶，无产阶級就愈容易认清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覺悟就愈容易提高，斗争也就会愈开展，愈激烈。資产阶級在反对封建专制时提出“自由”的口号，来爭取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在当时还有进步意义。但是当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逐渐提高覺悟，开始威胁到資产阶級的利益时，正如馬克思所說，他們就“害怕民众覺悟了”（“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1卷，莫斯科中文版，第313頁），随即就开始收回它关于自由的种种諾言，甚至公开違背它的諾言，对所允諾的自由加以种种限制，使之化为烏有。不过这时也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当阶級斗争还不十分尖銳时，資产阶級还不会公开拋棄民主自由的旗帜，还会利用“自由”的幌子来繼續进行欺騙。如果阶級斗争十分尖銳，劳动群众的覺悟更高，对它的威胁更大，使它不能再用“自由”的幌子来进行欺騙时，它就会不顾一切而扯下其“民主自由”的假面具了。在这时候，它也还会打着所謂“集会、結社自由”的招牌来組織黄色工会，建立冒牌的“工人”政党，以破坏工人运动，而对于真正代表工人阶級利益的工会和真正的工人阶級政党，則千方百計地加以限制和迫害。总之，他們是要資产阶級的利益至上，資产阶級的統治不能动摇。

一切民主自由都不能越出这一界限。所以，在某些资产阶级国家里，共产党能够存在，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恩赐”，而是由于无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能容许无产阶级的代表有多少自由，无产阶级能争得多少自由，随阶级斗争形势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同。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无产阶级担负起消灭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自然不能容许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对党有活动的自由。劳动人民占人口中的压倒多数，用不着隐蔽自己的阶级意图，所以能公开声明一切自由权利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对于社会主义的敌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当然，在我们国家是有民主党派存在的，但这些民主党派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担负帮助资产阶级分子进行自我改造的任务，真正为人民效力。它们并不是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的什么反对党。在工人阶级看来，必须这样才有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消灭阶级，建立新社会——的自由，否则就没有自由。而想要恢复其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当然会认为是不自由的。

至于劳动人民内部，也有一些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然而，无产阶级是大公无私的阶级，它的利益同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所以，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同剥削阶级内部各个集团相互间的利害冲突根本不同，完全可以在集中代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民主讨论的办法来得到正确的解决。而且由于工人阶级内部的利益完全一致，也就不会有在朝党与在野党的分别和对立。这是为团结一致来对付阶级敌人，保证劳动人民解放的首要条件，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必要前提。

只有那些迷惑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人们，才会觉得是不自由。

2. 有人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还有海德公园式的言论自由，你爱讲什么就可以讲什么。在我们国家里，则是舆论一律。虽说有百家争鸣，但争来争去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家对，发表了错误意见还要受到批判。”

不错，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舆论是不“一律”的，资产阶级既然不敢承认客观真理，而其内部又分裂为许多利益不同的集团，因此在资产阶级内部，除了维护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剥削的利益这一根本问题外，在其他问题上并不是有完全一致的意见的，所以，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舆论。除此之外，既然有无产阶级存在，当然便有无产阶级的舆论，这种舆论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资产阶级当然很想消灭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舆论成为清一色的资产阶级舆论，但是办不到，因为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了客观真理，它是驳不倒，灭不掉的。任凭资产阶级采用什么高压手段，它还是要在劳动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中传播，资产阶级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除了采取高压手段之外，一方面利用它所掌握的宣传工具来散布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言论和思想，以毒害劳动人民；另一方面，由于劳动人民的觉悟，露骨的资产阶级货色毒害不了，便收买一些无产阶级的叛徒来鼓吹修正主义，以便鱼目混珠。在资本所能控制的范围内，报纸、电台只发表资产阶级的舆论，不发表无产阶级的舆论，甚至歪曲报导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材料。学校只聘请传授资产阶级观点的教师，对于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教师，则采用种种办法加以迫害，而对修正主义者则加以捧场。礼堂、电视台也只供富人使用，穷人和无产阶级政治家无法登台演讲。最近英国举行大选，英国共产党被剥夺

了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广播的权利；在苏格兰的电视台上，英共的候选人只得到六十秒钟的时间来“解释”竞选纲领。重要的宣传工具已完全由资产阶级掌握，为了点缀门面，摆一个海德公园让人去讲一讲（当然主要还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讲），又有多大的危险呢？何况在海德公园演讲也不是没有限制，并且还有特务、打手在场监督，真正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言论又怎么能够在那里自由发表呢？可见，资本主义世界那种吵闹不休的“言论自由”，并不妨害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还是资产阶级利用来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方式。

在我们国家里，所谓“舆论一律”，如果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的话，那的确是如此。我们正需要有这样的“一律”，难道我们还能让反动分子来欺骗和毒害我们的人民群众吗？至于人民内部的舆论，则是既一律，又不一律。首先，我们允许人民内部舆论不一律，让广大人民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有在报刊讲台和各种会议上进行批评与争论的自由。人民群众中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正确的意见与错误的意见之间的矛盾，我们是要解决这一矛盾，但思想问题只能通过说理的方法来解决，真理不怕批评，不怕辩论，而且愈辩愈明。我们不会压制人民群众自由地发表议论，党和国家总是虚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坚决相信群众会通过实践和比较而认识真理。所以，我们不仅提倡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而且还放手发动广大群众用座谈会、大字报等形式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除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之外，试问世界上还有那个政党，那个政府敢于发动人民群众来开展规模如此宏大的整风运动，揭发和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呢？这对人民群众，难道不是最广泛、最充分、最真实的言论自由么？

当然，我们不能无目的地为争论而争论。百家争鸣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思想体系

与剥削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大鸣、大放、大辩论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是非，明辨真理，在思想领域内树立并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所以争论的结果必须服从真理，错误的意见就得改正，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得受到批判。争来争去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家对，那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真理，明确了真理，进而承认真理，思想才是真正的自由，硬要在真理面前坚持错误，按照错误意见去干行不通的事情，怎么会有自由呢？所以我们这里，争辩之后必然要有思想一致，行动一致，舆论要归于一律。

但是，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产生新的问题，出现新的意见。这仍然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通过群众的鸣放辩论来重新识别真理。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已经肃清了，也仍然会有先进与落后、唯物与唯心的思想之间的斗争。这样，人民内部的舆论总是由不一律归于暂时的一律，又由一律发展为新的不一律，然后又通过辩论达到更加接近绝对真理的新的一律，这样向前发展以至无穷。人的认识就是在这样地不断克服矛盾中进步提高的。思想认识愈前进一步，政治觉悟就愈提高一步，而人们认识、掌握和利用客观规律的本领也就愈大，行动也就愈自由，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也是无产阶级达到思想行动自由的必由之路，是真正的自由。资产阶级由于不敢承认客观真理而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只不过是自欺欺人，那里是真正的自由呢？

3. 有人说：“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每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发展自己的个性，选择自己的职业，决定个人的前途。在我们国家里，首先强调服从组织，没有发展个性的自由，没有个人的前途。”

在阶级社会里，个性同阶级性是不能分的，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个性，个人的兴

趣和爱好，都打上阶级的烙印，个人的前途，决定于当时的社会制度、他所在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资产阶级把个人享乐建立在绝大多数人受痛苦的基础上，在它看来，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可以破坏他人的幸福、牺牲集体的利益。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个性。无产阶级的个人幸福是建立在全体劳动者共享幸福的基础上的。每个人也都力求培养自己的才能，发挥自己的智慧，但其目的是把这一切无保留地贡献给伟大的人类解放事业，把个人的前途寄托于革命的前途，唯革命的利益是从。这就是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的个性。

资产阶级力求发展前一种个性，抹煞后一种个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资本家才有发展个性的自由，才有他们那种只顾个人私利的渺小“前途”，丧失了资本便丧失一切，人成为金钱的奴隶，人格变成了交换价值，医生、律师、文人、学者，虽然名义上是“自由职业者”，实际上只是被资产阶级雇佣的僕役。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都必须使资本家们有利可图，才有发展前途，否则就要受到排挤和压制。至于被剥夺了财产而受资本奴役的劳动人民，终日勤劳，仍不免于饥饿，在业者随时受着失业的威胁，失业者还忙不过来寻找劳动力的雇主，最低限度的生活还没有保障，那里谈得到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呢？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它比封建制度优越一些，形式上给了人民一点自由，但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这个吸血鬼的欲望，不知道摧残了多少劳动者的天才，毁灭了多少科学家的智慧。然而，资本主义不能万世长存，它现在已经到了死亡的前夜，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所以，资产阶级分子尽管在残存的资本主义世界里看来还很“自由”，可以作威作福，为所欲为，实际上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再没有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自由了。

反之，无产阶级却是一个新生的阶级，自食其力而生活并且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即与大生产相联结，因而也就具有最远大的前途，能够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自由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它要求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使劳动人民摆脱剥削和贫困，过美好幸福的生活。因而这个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就只容许有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而不容许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要求个人利益服从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在实现集体利益的前提下，也就同时实现了个人的最大利益。它要求发扬无产阶级的个性，这就必须同时消灭与这个个性相对立而妨碍其发展的资产阶级个性。所以，我们在鼓励人们确立远大的革命人生观时，必须坚决反对和清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个性的解放依赖于祖国和群众的解放，个人的兴趣必须服从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自觉地认识这一点，愉快地按照这种要求来行事，便是真正的自由。反之，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处处为个人的名利打算，这在旧社会中许多人不以为耻，而在新社会中则要受到人民群众的鄙视，因而对于个人也是没有好处，又无前途的。

反过来，如果能够按照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考虑个人的前途问题，那末，在我们国家里，每个劳动者都处于平等的地位，都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他们不是为剥削者，而是为全体劳动者的福利而劳动、而工作，各行各业都得到国家的关怀和人民的尊重，行行都可以出“状元”。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和专家，只要我们能够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来确立自己的志愿和理想，服从国家对于自己的工作的一分配，贡献自己的精力和才能，为祖国成大功、立大业，那真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有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怎么可以说在我们这里会没有个人的前途呢？

4. 有人说：“在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

国家里，生活水平很高，要买什么就有什么，不像我们这里有錢不能随时买到自己想买的東西。所以，单从物质生活的享受这一点来说，那些国家比我们自由些。”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家们取得利潤、发财致富。这样的生产必然要引起社会向两极分化，占少数的剥削者，集中掌握了社会的財富，而占社会上絕大多数的劳动群众，則日益貧困破产。在那种“有錢能使鬼推磨”的社会里，只有资本家有錢，他們当然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爱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爱怎么浪费就可以怎么浪费，甚至可以用金錢来购买肉体 and 灵魂，換取人格和良心。而广大劳动人民沒有錢，便什么都不能买到。尽管市場上五光十色，他們还是可望而不可及。一方面少数人穷奢极欲；另方面多数人无衣无食。朱門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写照。当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的时候，大量的牛乳、咖啡、面粉却倒入海里。对于采煤工人，冬暖而儿号寒，对于产粮农民，年丰而妻啼饥。这种极不合理的現象，在资本主义社会却不是怪事，而是常事。在美国，建筑了摩天大厦，可是就在这摩天大厦的旁边却散布着在我们国家里不能想像的貧民窟，难道在他們那里劳动者有在桥洞下过夜的“自由”就能說是真的自由嗎？

我們社会主义国家，首先致力于消灭私有制和剝削，鏟除产生貧困和奴役的根源，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滿足全体人民經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所以在我们这里，已經沒有危机和失业，劳动人民过去那种为了生活而卖儿鬻女，啼饥号寒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复返了，人人都摆脱了忍饥受冻的威胁。吃饱穿暖的生活难道不比饥寒交迫好千万倍么？我們原是“一穷二白”的国家，建国才不过十年，在党的领导下，生产已有飞速的发展，劳动人民的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善，不过还没有完全改变經濟落后的面貌，这

是事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們并不滿足于这种现状。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經濟落后的面貌呢？这就必須鼓足干劲，使生产不断地跃进，才能愈来愈多地滿足生活的需要。就是到了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可以充分滿足一切人的需要，可以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則了，也还不能任凭个人的主观愿望爱什么就可以无限地得到什么。同时，不断出現的新产品，在开始时总是不能立刻就完全滿足一切人的需要，等到能够完全滿足时，又会出现更新的产品，引起更新的、但不能立刻充分滿足的需要。所以，生产和需要总是有一定的矛盾的。能够自觉地利用这一規律来不断地推动生产，滿足需要，这就是自由。而硬要否认这一客观規律的存在，才是不自由。

当然，仍然留恋旧社会那种只有貴族、官僚、地主、买办、资本家才能享受的奢侈腐爛生活的人们，他們不能任意多买东西了，不能随意揮霍了，就会觉得不自由，就会恶意地歪曲真像說“解放前什么都能买到，現在什么都买不到。”但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劳动者，解放前由于资本家和地主的剝削和壟斷，他們实际上不可能购买生活必需品，而現在則是情况完全改变了。我們的党按照人民群众的願望来领导生产大跃进运动。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却站在资产階級立場来反对生产的飞速发展，污蔑大跃进，說什么这是違反經濟規律而造成“全面緊張”。这完全是歪曲事实的污蔑。我們要坚决貫徹党的总路綫，在加速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人民的需要得到不断的滿足。这正显示我們在利用經濟規律来解决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中有真正的自由。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想开倒車，那是沒有自由的。

三、进一步改造思想，鍛炼立場，为肃清资产階級自由观点而斗争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不同的

自由觀对于具体的自由問題有不同的看法。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这个著作中指出：自由、民主这些东西，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它們属于政治上层建筑，总是为一定的經濟基础服务的（見此书第5頁）。所以，在階級社会里，不同的階級不仅有不同的自由觀，而且还各以其自由觀作为进行階級斗争、实现本階級的目的的手段。資產階級自由觀是巩固資產階級专政、保証資本主义利潤的手段。无產階級的自由觀是巩固无產階級专政、消灭資本主义并保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手段。資產階級自由主义思想在反对封建专制时期誠然有过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这种思想对无產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就只能是进行統治和欺騙的工具。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人民群众在无產階級领导下进行反对法西斯化、爭民主、爭自由的斗争，其鋒芒是反对反动的統治階級，其目的在于揭露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的階級本质及其虛伪性，以提高劳动群众的覺悟，把更多的劳动群众团結在无產階級政党的周圍，为社会主义革命創造条件，因而是进步的、正义的斗争。在我們国家里，資產階級右派及其他反动分子所叫嚷的“爭民主、爭自由”，其鋒芒則是反对工人階級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爭反革命活动的“自由”，其目的在于推翻无產階級专政，实现資本主义复辟，因而就不能不是彻头彻尾的反动。

所以，自由觀上的对立，归根到底是立場問題。凡是站在无產階級的立場，有共产主义覺悟的人，总是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放在第一位，認識到凡是实现了这一根本利益所作的一些限制并不妨碍自由，反而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必要条件。凡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受到資產階級思想影响，保留着資產階級自由觀的人，总是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是否能达到个人的名利和前途以及滿足个人的生活享受作为衡量是否自由的标准，对社会主义制度总是感到不习惯，觉得不自由。沒有共同的階級立場，对于自由就不会有也不能有相同的感受。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在各个战綫上取得了偉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設正在飞跃发展，处在这样一个偉大的历史时代，任何一个人只有順应这个时代的潮流才有自由，硬要違抗时代的巨流，好比“螳臂当車”，那是得不到自由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必須端正立場，努力学习，提高覺悟，改造思想，破自私自利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人生观、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產階級共产主义人生观，灭資產階級的自由主义、兴无產階級的集体主义，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来發揮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地奋斗，这样才能从必然的王国进入自由的王国。

更 正

本刊今年第4期第27頁左栏第22行“但是，我們的国家並沒有向他实行专政。应为“但是，我們的国家对他們采取了更为寬大的政策。”

本刊今年第5期第63面第7行“（德国，女）”，应为“（法国，女）”。

改造罪犯政策的偉大胜利

顾 方 平

在偉大的建国十周年节日的前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澤东同志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的建議，决定对经过一定期間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滿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刘少奇主席根据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了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已于12月4日特赦了首批战争罪犯。这是我們国家政治生活中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它表明我国人民民主政权已經空前巩固和强大，表明我們党和政府对各种罪犯的劳动改造政策已經取得了偉大的胜利。

現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极为良好，社会主义革命不論在經濟战綫上还是在政治思想战綫上，都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設已获得輝煌的成就，特别是去年以来，全国人民在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更使我們祖国的面貌煥然一新。十年来，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現在反革命分子已經基本肃清，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人民民主专政空前巩固和强大。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同时，由于党和政府的劳动改造政策的正确贯彻，多数罪犯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一批罪犯确实已經改恶从善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一部分罪犯实行特赦，是非常适时的，是完全正确的。

我們的特赦和旧中国历代政府以及近代各资产阶级国家的特赦有本质上的不同。他

們是为了维护剝削阶级的統治，緩和阶级矛盾，其实这些矛盾并不能消除；我們是为了改造社会、改造人。我們的特赦不是针对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罪，而是以各种罪犯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是否确实改恶从善为最根本的标准。这样做，首先，它給各种罪犯都指明了出路，指明了努力方向，只要他們认罪服法，改恶从善，都有光明的前途。这样就有利于那些受到特赦的罪犯进一步地改造自己；对沒有被特赦的罪犯，也有重大的教育作用，有利于对他們繼續改造；同时对那些还隐蔽在社会上的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可以起教育、分化、瓦解的作用，因而更有利于肃清和改造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次，由于只有确实改恶从善的才能受到特赦，而沒有改恶从善的便不予特赦，这就防止了尚未改造好的罪犯被釋放后繼續危害社会。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人民負責和对罪犯改造的严肃态度。如果不以是否确实改恶从善为主要标准，而籠統的以一定刑期和一定的罪为特赦的条件，那么便不可避免地会有一部分还没有改造好的罪犯被釋放出来，显然这对社会秩序的安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都是极不利的。

我們的特赦規定以服滿一定的刑期做为适用特赦的条件之一，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們知道，各种罪犯、特别是反革命罪犯，曾經长期居于压迫者和剝削者的地位，在他們的头脑里不但有着根深蒂固的反动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还浸透了腐朽的寄生虫生活的恶习。要把这些人改造过来重作新人，需要有一个改造过程，不经过一定期間的劳动

改造，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另一方面，这些罪犯是否真正认罪服法、改恶从善，不经过一定期间的考察，也是难以认定的。

由于各种罪犯犯罪的性质不同，罪恶的大小不同，表现在实际改造过程上也往往不同，有的需要较长时间的改造，有的则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一般说来，偶犯容易改造，惯犯和累犯较难改造；从犯容易改造，主犯较难改造；劳动人民出身的罪犯容易改造，剥削阶级出身的罪犯较难改造。另一方面，从他们犯罪的社会影响来说，对于那些罪行严重的罪犯，依法判处了较长的刑期，特别是对于反革命罪犯，如果不经过相当长的服刑期间，不仅事实上改造不好，而且释放得早了，也会引起劳动人民的反感。因此，特赦令把各种不同的罪犯，根据犯罪的性质和原判刑期的长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服刑期间，是反映了改造罪犯的实际情况，是体现了严肃谨慎、区别对待的精神的。

我们的特赦令，不但对普通刑事罪犯可以实行特赦，而且还包括了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以及反革命罪犯，因而特赦的面是相当宽的，这也是我们特赦的一个特点。有些人耽心这样做是否太宽了。实际上这种耽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第一，我们要赦的只是那些服满一定的刑期、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如果没有改造好，我们就不赦。第二，我们向来认为，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转变的，愿意带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的人究竟是少数。事实上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有一批罪犯确实改恶从善了。第三，对确实改恶从善的反革命罪犯实行特赦，可以进一步促使反动派的分化瓦解，把那些顽固不化的死硬派孤立起来，有利于我们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第四，现在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权空前巩固强大，人民群众的组织和觉悟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释放一批确实已改恶从善的反革命分子，把他们安置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是能够防止发生危险的。

如果被特赦的人敢于再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和犯罪活动，我们就会依法再捕再判，累犯重判。因此，对反革命罪犯实行特赦，不但丝毫不会削弱人民民主专政，而且更有利于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

我们的特赦还规定对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和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可以实行减刑。至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所以没有提到减刑的问题，是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中已经有了具体的规定，并且在几年来的劳动改造工作的实践中，已有许多罪犯因有悔改和立功表现，得到减刑的宽大处理。

我们的特赦，充分显示了改造罪犯政策的伟大胜利。建国以来，我们逮捕关押了那些必须逮捕关押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从而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党和政府对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采取了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劳动改造是革命的人民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继续，是彻底消灭犯罪的重要手段。对于这些犯罪分子，不仅要依法逮捕，给以应得的处罚，防止他们继续危害社会，而且要强迫他们参加劳动，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通过劳动改造成为新人。我们从来是把改造犯罪分子看成是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任务，是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工作的一部分。十年来，许多罪犯经过劳动改造，已经成为新人，有的服刑期满已被释放，有的在服刑期间由于确有悔改和立功表现，也陆续得到减刑或假释或提前释放等宽大处理。本来是好逸恶劳、一无所长、专靠犯罪吃饭的罪犯，经过劳动改造，有些已经痛改前非，养成劳动习惯，学会一定的生产技能，甚至有的成为比较熟练的技术工

程人員；有些罪犯本來是文盲，經過幾年的勞動改造，竟能閱讀普通的書報雜誌了。他們用自己的切身體驗把新舊社會加以比較，得出的結論是：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他們把黨和政府稱做再生父母，把勞動改造機關的工作人員稱做恩人。所有這些，都充分表現了勞動改造政策的無比正確和巨大作用。

我們的特赦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勝利發展的結果，是鎮壓反革命運動獲得偉大勝利的結果，這雄辯地證明了我國政權的空前鞏固和強大。帝國主義分子和國內的反動分子胡說什麼“大躍進失敗了”，人民公社運動“搞糟了”。但是，任何造謠和誣蔑在事實面前，總是要被徹底粉碎的。讓敵人用造謠誣蔑給他們自己壯膽去吧，無論敵人怎樣狂吠和哀鳴，都絲毫不能影響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上，正以雄健的步伐飛躍前進。

現在，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完

成，產生犯罪的社會根源正在逐步消失，隨着人民民主專政的日益鞏固，勞動人民羣眾覺悟程度和組織力量的日益提高，犯罪分子更加孤立了，犯罪現象也在日益減少。但是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最後完成，階級和階級鬥爭仍然存在，殘余的反革命分子還在伺機而動，台灣尚未解放，帝國主義分子還不甘心他們在中國的失敗，他們還不斷地派遣特務間諜來我國進行顛覆和破壞活動。因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決不要因為特赦令的公布而發生錯覺，從而產生麻痹思想。革命警惕性是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的可貴品質，任何放鬆警惕的麻痹思想，都是錯誤的，極其有害的。在整個過渡時期中，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針對這種鬥爭的一起一伏的特點，我們必然也有相應的措施。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只要我們保持着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在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依靠廣大羣眾，就一定能夠粉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一切破壞活動。



审判工作怎样贯彻群众路线

王 云 生

审判工作贯彻群众路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工作区别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法院是保护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一切反动的法院都是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无情地镇压劳动人民。因此，在人民心目中，它的每一活动只能增加人民对它的憎恨。人民法院是镇压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锐利武器，它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它的活动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欢迎。

审判工作贯彻群众路线是人民法院的优良传统。人民法院从其建立时起，就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条路线，经常教育干部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坐堂问案的現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充实着新的内容。

在建国初期大规模地群众性地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采取了由政府任命的审判员和群众选出的陪审员一起组成人民法庭，直接接受群众的检举、控诉，让群众向地主、恶霸和反革命分子展开斗争，查明犯罪事实，根据群众要求依法进行审判。

在经常工作中，一切从便利群众出发，设问事处或接待室，接待人民来访，解答群众有关法律问题，代写诉状或记录诉讼当事人的请求，并且深入群众，依靠群众，查清事实，就地审判，就地调解，帮助和指导基层调解组织，开展调解工作，等等。

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情况，可以设立若干人

民法庭，并且规定了公开审理、陪审、合议、辩护等制度。这些规定，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工作的优越性，充分地体现了人民法院便利群众，联系群众，贯彻群众路线的审判原则，使审判工作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保证了案件正确、合法、及时的处理。同时，通过审判活动，使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直接与群众见面，这就对人民群众进行了实际的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和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有效地发挥了审判武器惩罚犯罪，预防犯罪，解决纠纷，预防纠纷的积极作用。

审判工作贯彻群众路线，是法院工作取得群众支持，获得对敌斗争胜利的一项重要保证；是每个案件达到正确、合法、及时处理的决定条件。正由于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执行了这条路线，才胜利地完成了每个时期的审判工作任务，适时地打击了敌人，惩罚了犯罪，解决了大量的民事纠纷，有力地保卫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审判工作贯彻群众路线，是不断同旧法观点和旧法作风进行着尖锐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和完整起来的。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曾经严厉地揭发与批判了旧法观点与旧司法作风的残余影响，使所有司法干部从思想上划清了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明确认识了群众路线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唯一正确路线。1954年各级人民法院在学习与贯彻人民法院组织法时，又进一步检查和批判了司法干部中残存的旧法观点与旧司法作风的思想影响。但是，在法院系统中，社会主义与

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並沒有結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又散布反動的資產階級法律觀點，反對審判工作貫徹群眾路線。他們把走群眾路線貶之為“農村作風”“游擊習氣”“不正規”等等。一部分受舊法觀點侵蝕和影響的人，由於不了解黨和國家的政策法律是廣大勞動人民羣眾意志的集中表現，是羣眾鬥爭的經驗總結和進行鬥爭的工具，也錯誤地把政策法律看成是一種特殊玄妙的東西，把依照法律程序辦事同貫徹群眾路線對立起來，生怕走群眾路線“有失法庭尊嚴”、“不能保證办案質量”，而不願積極貫徹執行。司法戰綫上的這一鬥爭，到1957年的整風、反右派，全省各級人民法院在黨的領導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在偉大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勝利的基礎上，廣大司法干部的政治覺悟有了很大提高。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大大發揚了革命的創造精神，徹底轉變了某些脫離羣眾的作風。在工農業生產大躍進形勢的推動下，開展了司法工作大躍進。在司法工作大躍進中，各地法院除較普遍地實行了就地調查，就地審判（調解）外，並廣泛採取了法庭審判與羣眾辯論相結合的審判方式，進一步發揚了羣眾路線的優良傳統。

法庭審判與羣眾辯論相結合，是司法工作貫徹羣眾路線的一個新的发展；是黨的大鳴、大放、大辯論的羣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在審判工作中的具體運用。採用羣眾辯論處理案件的結果證明：（1）更便於依靠羣眾，查清案情，正確處理案件。對於刑事案件來說，是直接發動羣眾揭發了犯罪，使案件獲得充分的証據材料，迫使犯罪分子在羣眾面前無法狡辯抵賴，有效地孤立和打擊犯罪分子的囂張氣焰，教育羣眾划清敵我界限，提高革命警惕。羣眾行動起來之後，就可使敵人和各種犯罪分子的活動空隙更加縮小，從而達到預防犯罪和減少犯罪的目的。對於民

事案件來說，通過擺事實、講道理，情況搞的更加全面踏實，思想問題解決的更加深透。由於羣眾面對當事人擺清了事實，講透了道理，說明了利弊，作到正確處理，執行時一般是很順利的。（2）以活生生的事實，向羣眾進行了宣傳，教育和提高羣眾的覺悟，樹立共產主義的道德風尚。它比單純的向羣眾作法律講演，或開庭時吸收羣眾參加旁聽，效果更為良好，使黨和國家的政策、法律更加深入人心。（3）由於從各個角度上聽取了羣眾的意見和反映，因而使人民法院在處理案件時，考慮的更加全面周到，有效地保證了案件質量，提高了工作效率，避免和防止了可能產生的某些缺點和錯誤。（4）可使審判工作更好地置於廣大羣眾的監督之下，取得羣眾的幫助和支持。不少審判人員從實踐中体会到，只有集中羣眾的智慧，才是最大的智慧；法律只有為羣眾所掌握，才能正確的被執行，才能發揮它的威力。

隨着工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和司法干部，直接參加中心工作、參加生產勞動，審判工作的羣眾路線，又進一步發展到審判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即：審判人員到那里办案，就在那里參加生產，利用空隙進行審判；到那里參加中心工作，就結合了解那里的情况，發現問題，依靠黨委，及時處理。司法干部參加生產勞動，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在羣眾之中，就更加密切了與羣眾的聯系，同羣眾建立深厚的感情。更加便於了解當地中心工作情况 and 羣眾的要求，使審判工作更好地圍繞黨的中心工作，從羣眾的切身利益出發開展審判活動，為黨的 center 任務服務，真正做到把審判工作与黨的中心工作溶合在一起，與廣大羣眾溶合在一起，與生產溶合在一起。隨時隨地的宣傳黨的政策，教育和提高羣眾的覺悟。同時，並可使司法干部從中學到生產和階級鬥爭知識，增強羣眾觀點，豐富為人民服務的實踐經驗。通過審判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工作路線，使干部得到全面鍛煉，逐步成為

既懂得階級鬥爭，又懂得生產鬥爭，既會從事腦力勞動，又能從事體力勞動，從而為逐步減少以至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創造條件。

建國以來，我省審判工作的實踐，有力地說明了：依靠群眾，相信群眾，吸引廣大群眾參加司法活動，是人民法院處理一切案件的唯一正確路綫。只有如此，才能及時有力地鎮壓敵人，懲罰犯罪，迅速而正確地解決人民內部糾紛，勝利地完成審判工作任務；只有如此，才能發揮人民法院審判武器的特有職能，保衛黨的中心工作，保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實踐證明：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貫徹群眾路綫，首先必須教育審判人員樹立起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觀點，具有高度為人民群眾服務的精神。這是貫徹群眾路綫的思想基礎和首要條件。人民法院對敵人實行專政，懲罰犯罪，必須依靠群眾，充分發揮廣大群眾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完成它的任務，真正成為敵人害怕，群眾歡迎的人民司法機關；才能使案件的處理達到“正確、合法、及時”的要求，既能避免錯誤，防止偏差，正確的貫徹黨和國家的政策，又能體現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毛澤東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中指出：“我們在肅反工作中的路綫是群眾肅反的路綫。採取了群眾路綫，工作中當然也會發生毛病，但是毛病會比較少一些，錯誤會比較容易糾正些。群眾在鬥爭中得到了經驗。做得正確，得了做得正確的經驗。犯了錯誤，也得了犯錯誤的經驗”。毛主席的這一指示，是我們審判工作行動的指針，也是我黨多年來對敵鬥爭的經驗總結。任何認為“審判工作貫徹群眾路綫會失去法律尊嚴”、“影響办案效率”、“不能保證办案質量”，以及“怕麻煩”、“怕艱苦”等不願走群眾路綫的思想，都是脫離群眾，孤立办案的舊法觀點的反映。

實踐證明：貫徹群眾路綫，必須放手發

動群眾，把專門機關的工作與廣大群眾的積極行動結合起來。社會上任何犯罪行為或糾紛，都不會是孤立的，它必然或多或少的在群眾中留有印象，終為群眾所了解。因此，只要認真發動群眾，就是某些比較難辦的案件，也會很快弄清底細，找出關鍵。群眾行動起來之後，不僅能夠從各方面揭發事實，提供證據，而且還能提出恰當的理由和正確解決案件的意見。我們不易發現的證據，群眾給補充了，我們想不到的問題，群眾提出來了，一時不好解決的問題，由於群眾出主意想辦法，也就迎刃而解。因此，幹部從實踐中体会到：所謂疑難案件，不是案件難辦，而是孤立办案，不深入群眾，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關鍵。但是，走群眾路綫，還必須加強專門機關的工作，加強組織領導。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帶領群眾，發揮群眾的智慧和力量。不相信群眾，孤立办案，是脫離群眾的舊法作風；不注意領導群眾，作好組織工作，“群眾說啥是啥”是尾巴主義的一種表現。偏到任何一個方面都是不對的。

實踐證明：貫徹群眾路綫，必須堅持從實際出發，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的原則。調查研究是弄清案情事實的先決條件，是正確處理案件的根據。調查研究的目的是為了發現案件的真實情況，正確地適用法律。在調查研究中，必須听取各方面的意見，不僅听取群眾和有關方面的意見，而且要听取當事人的意見；不僅要搜集正面的意見，而且也要注意反面的意見。儘管由於群眾的覺悟程度、生活經歷和與案件結果所處的關係不同，但是，他們是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問題和觀察認識問題的。我們的責任就是要把來自群眾的大量意見，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和以階級分析的方法，從反面、正面和相互矛盾着的意見中，分清那些是正確的，那些是不正確的，那些是先進的，那些是落後的，從而去偽存真、由表及里，全面分析，得出正確的結論。任何忽視調查研究，缺乏實事

求是的精神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觀片面，都会产生輕纵敌人或誤伤好人的錯誤。

实践証明：貫徹群众路綫，必須同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結合起来。人民法院通过它的全部活动，宣傳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教育公民忠于祖国，自觉地遵守法律，是它的一项重要任务。实行就地审判(調解)、就地宣判和法庭审判与群众辯論相結合，是向群众进行宣傳教育的良好形式。群众受到教育，他們的政策水平、法律观念提高了，他們的行动和要求就会符合于党的政策原則，使問題的处理，能够建立在与广大群众統一意志的基础上，鼓舞群众同各种犯罪做斗争，形成一种社会輿論的压力，使違法犯罪分子有所惧怕，起到懲罰犯罪的作用，由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增强了，糾紛也就减少了，人民的团結也就增强了，从而有利促进生产，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設事业。

实践証明：貫徹群众路綫，必須根据不同类型案件和案件本身的特点，切实执行法律規定的各项审判制度。貫徹群众路綫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具体运用中必須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案件的不同特点，采取有利于对敌斗争，有利于中心工作，便利群众，为群众乐意接受的形式。大跃进以来，各地实行审判与生产劳动相結合，就是其中很好的一种形式。审判人員在同群众一起劳动中，了解情况，空隙時間进行审判。审判活动的方式，有座談会、辯論会，有小型的，也有大型的，有調解，也有判决。这样既不耽誤群众生产，又能使案件办的又快又好。法律

規定的各项审判制度和公安、檢察、法院三个机关的互相配合、相互制約的原則，既是为了正确、合法、及时的处理案件，又是为了吸引群众参加司法活动。它与走群众路綫是完全一致的。那种认为走群众路綫就不能执行审判制度，执行审判制度就不能貫徹群众路綫的想法与作法，都是片面的。当然，执行中必須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的灵活运用，决不能机械的执行制度，而使案件拖延积压，刁难群众。不分時間、地点、条件，事无大小，案无輕重，追求一律的所謂“正規”形式和手續，是形式主义和旧司法作風的表现；但是，在走群众路綫中，忽視了依法办事，也同样是錯誤的。

实践証明：貫徹群众路綫，必須絕對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党委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参加生产劳动，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这是从实践經驗中，总结出来的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必須遵循的一条根本路綫。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是运用和貫徹执行党和国家政策法律的工作，是对敌专政的工具。正确地运用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必須从当时当地的阶级斗争形势和中心工作出发。而阶级斗争形势和中心工作，以及群众的意見与要求，只有党才能全面了解和掌握。因此，审判工作的活动，必須置于党的絕對领导之下，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只有如此，才能使案件的处理达到正确、合法、及时，符合于广大群众的意見和要求，避免审判工作迷失方向，有力地保卫社会主义建設。

(作者系山东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长)

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

張 健

十年来，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澤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惊天动地的大革命，开展了突飞猛进的大建設。在进行大革命、大建設的同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个战綫上都出现了許許多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偉大的創造性的事迹，其中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法工作，同样也出现了許多新的創举，它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国务院在1957年8月3日頒布的“关于劳动教养問題的決定”，就是我国政法工作中創造性的范例之一。根据这一決定的精神，对于那些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以及游手好閑、違法亂紀、不务正业而有劳动能力的人，采取劳动教养的方法，把他們收容起来，实行强制性的教育改造，这是巩固社会秩序，預防犯罪的有效措施，也是对他們安置就业、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一种革命办法。

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問題的決定”，是根据我国阶级斗争的实际情況，总结了国民經济恢复时期試办劳动教养的經驗制定的，也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发展的需要制定的。大家知道，我国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经历了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整風和反右派的斗争，在經濟战綫上、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特别是1958年以来，在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我国工农业生产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我們国家政权空前巩固了，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風

尚得到了高度的发揚，六亿人民正以翻天覆地的革命气慨，改造旧社会，建設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就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也是无法否认的。

十年来，在我国已經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打击了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渣滓，实行了改造。并在这方面創造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但是，这并不等于說已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所有的危害社会秩序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分子都改造好了。何况这项改造工作是长期的，艰巨的，如果只采取某一种办法是不可能把所有的坏分子都改造好的，而是应该根据不同情况 and 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才能把这些人改造好。1957年8月3日国务院頒布的“关于劳动教养問題的決定”，就是根据国家政治和經濟的发展需要，对不同的对象所采取的具体的改造措施。关于劳动教养的对象，在決定中明确指出：（1）不务正业，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刑事責任的盜竊、詐騙等行为，違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2）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3）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內，有劳动力，但长期拒絕劳动或者破坏紀律、妨害公共秩序，受到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4）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轉业的安置，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不断地无理取鬧、妨害公务、屡教不改的。

从上述劳动教养对象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尽管这些人在社会上为数不多，他們違反法紀的情节还不十分严重，可以不追究刑

事責任，但是，由於他們游手好閑，違反法紀，妨害公共秩序，破壞社會主義事業，對於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則是不容忽視的。因此，人民政府對他們實行強制性的教育改造，組織他們勞動生產，安置他們就業，發給他們勞動工資，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符合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廣大人民羣眾利益的要求的。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所謂被改造的客觀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對改造的人們，他們的被改造，須要通過強迫的階段，然後才能進入自覺的階段。”^①毛主席這一英明的教導，正是我們國家制定“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的根據。實踐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的。我們除了繼續同極少數有現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進行鬥爭之外，對於這部分社會渣滓，必須強迫他們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許他們破壞社會主義事業；要調動他們的双手，去參加建設社會主義，不許他們游手好閑。只有把他們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才能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從而才能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

同時，改造這部分厭惡勞動的分子，也是預防犯罪和消滅犯罪的一個重要手段。因此，正確地貫徹執行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實際意義的。

二

幾年來，我國各地勞動教養機關，在黨的領導下和廣大人民羣眾的支持下，加之各政法部門的有力協作，對於應該收容安置勞動教養的分子，採取了一面收容安置、組織生產；一面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大搞思想改造的各項運動。經過勞動生產和一系列的政

治思想教育和改造工作，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已獲得了良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從國家舉办的勞動教養機關、已組織起來的各種生產單位來看，絕大部分勞動教養分子已投入生產勞動，基本上沒有坐吃閑飯的現象。特別是1958年大躍進以來，各地勞動教養機關的工作人員，在全國大躍進的形勢影響下，也發揮了沖天的干劲，以積極的措施，組織勞動教養分子生產勞動。有不少農場已經實現了農業發展綱要中所提出的“4、5、8”的指標；有的還獲得了大面積的豐產。在勞教工業生產單位中，有不少勞教分子，積極努力革新技術出現了不少創造發明，他們不僅學到了工農業生產方面的技術；而且其中確有一部分人改變或正在改變着他們的不勞而獲的寄生思想。

上述事實，不僅充分地說明了正確執行勞動教養政策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重大意義，而且證明了黨和國家制定這一政策的偉大和正確。只要能夠認真地貫徹執行中央所提出的“勞動生產和政治教育相結合”的改造方針，以及正確地執行改造這些分子的政策、措施，就有可能使我們已經建立、組織起來的勞動生產單位，成為改造他們反动思想的熔爐和安置他們就業的場所。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對於這些人通過勞動教養，把他們的双手調動起來，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因素。因此，◆廣大人民羣眾稱贊這一政策是“對國家好，對勞動教養分子家屬好，對其本人好”的“三好政策”，是“利國家、利人民、利勞動教養分子家屬、利其本人”的“四利措施”。例如，天津有個叫魏××的青年，過去有流氓、盜竊行為，經常打架斗毆，污辱婦女，他的家庭對他是毫無辦法的，當地派出所曾經教育過多次，他也很少悔改，可是後來，經過不到一年時間的勞動教養，

① “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95頁。

不仅在生产劳动中表现积极，而且能够把每月工资的剩余部分寄回家用。他的母亲感激地说：“人民政府能把胡作非为的人改造成能够劳动的人，能够挣钱养家，实在不容易。”有的群众这样来形容被劳教分子的转变和人民政府对于他们有力的改造：

“挖去游堕根，前后两个人”；

“坏人变好人，石头亦成金”；

“两手仍依旧，作用大不同”；

“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这就是人民群众对于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所获得的重大成就的评价。

此外，还有不少劳动教养分子本人，经过教育改造之后，他们怀着欢欣激动的感情，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他们的“重生父母”；其中有的劳动教养分子在出所出场之后，全家写信感谢党和政府对于他们的教育改造，使他们得到了“重新做人”的机会，学到了“技术”，并且还保证：“遵守政府法令”，“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等等。

由此可见，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具体条件下，是解决旧社会遗毒这一复杂问题的有效措施，是我国政法工作中的一个新的创举，它对教育群众，树立守法观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因此，它深受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当然，对于这部分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斗争。因为他们不劳而获习以成性，例如，一个有流氓、盗窃行为的分子说：“我在白天向来闻酒肉之香，晚上尽作鸳鸯美配之梦”，这句话，对于这些有流氓、盗窃行为的分子来说，是一个真实的写照。他们不仅自己败坏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而且引诱别人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这正如列宁所说的：富人、骗子和剥削者是资本主义养育成的两种主要寄生虫。可见，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不是

在一个早上就可以铲除的，而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因此，我们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所制定的这一政策的同时，还必须认真地总结在执行这一政策中的经验，正确认识劳动教养制度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就能够更有力地驳斥各式各样诬蔑这一制度的谎言。

三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劳动教养制度所以说是我国政法工作中的一个新的创举，这是因为：（1）这一决定的提出和确立，既反映了我国当时的阶级斗争情况，又充分地总结了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地试办劳动教养的经验。这就是说，确有这样一些坏人，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没有效，采取简单的惩罚办法也不行，只有把他们收容起来，采取劳动教养的办法，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和群众要求的。（2）经验证明，对于这些分子实行劳动教养，既是改造他们的一个良好场所，也是安置他们就业，保障其生活出路的一个妥善的办法。这种办法，显而易见，同劳动改造罪犯是有区别的，它更不同于救济鳏寡孤独的教养院，而是一种强制性的行政制度，它既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也是专政的手段，同时也要促使他们在改造过程中的自觉性，通过劳动生产和政治思想教育，从而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这就充分反映了这一制度的特点。毫无疑问，这一创举，对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法学家”，由于他们的反动立场决定了他们必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所以他们中的某些人，在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对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也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法学家”攻击我国实行劳动教养制度“违反宪法”，从而企图在根本上否认这一创造性的制度的合

法性，这是一个最露骨的恶毒攻击。

如前所述，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实施的，这一决定又是在1957年8月1日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制定法令的职权，是我国宪法第31条所明文规定的，因此，这一决定具有立法性质，是丝毫也不容怀疑的，同时，宪法第10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所指出的一些应该实行劳动教养的对象，正是一些破坏了宪法第100条所规定的精神的人，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实，硬说劳动教养是“违反宪法”，这就不难看出，他们并不是真正关心我国的宪法，而是企图通过攻击宪法，从而否定劳动教养制度在我国巨大作用。因为劳动教养制度保障了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及革命的秩序不受破坏；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对劳动教养分子的关怀。所有这些，则正是资产阶级右派和“法学家”所不愿看到的。正是因为这些劳动教养分子的被改造，使他们失去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幻想越来越破灭，因此，他们对劳动教养制度的敌视和诬蔑，自然就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了。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法学家”敌视社会主义，敌视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发展着的新的东西，他们妄想使社会停滞不前，妄想使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复辟，因此，他们在法律问题上，还抬出反动的旧法观点和反动资产阶级法律的一套所谓“规格”来迷惑群众，企图以此来束缚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向一切坏人坏事作斗争的手脚，以利他们进行其复辟的阴谋。基于这样一个目的，他们还把“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一创举，诬蔑为：“不合‘规格’，不成其为法律的所谓‘四不像’”。在这里，必须

指出的是：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我们的法律体现不断革命论的精神，鄙视资产阶级法的一切“陈规”。我们要不断地破旧立新，不受任何陈规陋矩所拘束。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规定什么样的内容，都是以是否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决定的。我国劳动教养制度之所以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正是因为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反映了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由此可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无产阶级的立法，是来源于群众，同时又是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这正是我国立法与资产阶级立法的根本区别。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法学家”，还同帝国主义异口同声地诬蔑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是“奴役劳动”、等等。这正说明了他们作贼心虚的惊慌心情。大家知道，奴役劳动的创造者，正是资本主义所维持的剥削制度本身。这一事实，列宁早就指出过：“……资本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雇佣奴隶制，是一种现代的（摩登的）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奴役千百万劳动人民、工人、农民的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法学家”们对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这一恶毒攻击，正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本质所制造的一种谎言。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党和国家所实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对于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违反人民利益的分子来说，通过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反动思想，树立了他们的劳动习惯；同时，也使他们学到了生产技术，促使了他们的新生。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不劳动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原则。所有这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的，这正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 * *

让帝国主义者去造谣和诬蔑吧！这种造谣和诬蔑除了说明劳动教养这一制度是利

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人民的一项新的创造性的制度以外，别的是什么也不能说明。因为帝国主义者攻击和诬蔑的事情，总是我们办得很对，办得很好的

事情，这已是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一条真理，而在劳动教养问题上则又一次地得到了证明。

动态

湖北大学法律系结合教学开展学术活动

湖北大学法律系的学术活动最近一个时期显得活跃。

学校党组织一贯重视学术活动，把它作为贯彻百家争鸣、提高广大教工同学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有效方法，作为改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措施。

根据系党总支的要求和部署，各教研室和年级的党组织在具体领导教和学的过程中，发动教师学生经常注意掌握教学内容中所存在的疑难问题、争论问题和薄弱环节，以及在各项政治运动中所持的不同思想观点，有计划地进行专题研究。系部直接组织力量抓重大的项目，一般项目由系属各单位具体掌握。在确定研究项目时，就安排好学术辩论的计划。一般以大的节日，如元旦、五一、七一、国庆作为全系学术活动最高潮的时期，平时则由各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灵活组织。

从今年2月份到9月份为止，就一共组织了大中小型的辩论会三百四十八次，参加人数约一万一

千五百二十人次；其中由系部组织的大型学术讨论会，每次都有当地政法实际部门、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的工作人员参加。这三百四十八次讨论会共讨论了二百多个大大小小的问题。例如：政法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我国工农联盟的发展；人民公社是我国基层政权的最好组织形式；人民公社化后农村婚姻家庭关系的发展变化；……等等。

在每次辩论会后，教工同学都针对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论点，各抒己见，人人动手写文章，形成了一个紧密结合教学的连续不断的写作——讨论——写作的高潮，大大活跃了科学研究的风气，有力地配合了教学工作的开展，使教学质量得到不断的提高。

最近，结合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学习，又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项目，并准备在12月份，首先组织一次以保卫党的总路线为中心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讨论。

(湖北大学法律系通讯组)

資產階級“三權分立” 學說的虛構性和反動本質

康 樹 華

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學說，是17—18世紀西歐資產階級理論家提出來的一種學說，這些理論家一般都堅持必須在國家中劃分三種權力——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而這些權力的職能則由各種不同的國家機關來行使。這個學說的產生，是為了論證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妥協性，為了保卫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以反對君主專制政體為目的。它在18世紀法國和其他國家的社會政治生活實行資產階級民主改造的道路上，是向前邁進了一步。然而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後，“三權分立”學說，就被資產階級辯護人廣泛地用來欺騙人民群眾，掩飾資產階級所實行的專政。資產階級的法學家們說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分權（似乎是保障個人自由的）時，就竭力把資本主義國家組織的現行制度，描寫為社會的政治組織的“最優良的”形式。所以，批判資產階級“三權分立”的虛構性，特別是揭露資產階級國家憲法中“三權分立”制的反動性，就有着重大的政治意義。

一、“三權分立”學說的產生 和它的本質

提起“三權分立”學說，人們就想起孟德斯鳩，實際遠在孟德斯鳩以前，已有分權的思想。例如：當資本主義萌芽於意大利時，有名的資產階級城市共和國——意大利佛羅倫薩城——的資產階級學者馬克威里，就是分權論的主張者，他主張：平民（即資產階級）應在憲法中占一地位，國君、貴族、平民，“這三種勢力應互相牽制”。

分權理論，在1640—1660年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在英國資產階級學者洛克（1632—1704年）的著作中得到了發展。洛克在其有名的著作“政府論二篇”（1689年）一書中將自然法的學說和社會契約的學說加以結合後，就希圖用這樣的方式來捍衛自己的理想——君主立憲制。據他武斷的說法，在君主立憲制中，可以為分權原則的實現創造最良好的條件。這個原則，據洛克的看法，需要在國家中劃分三種權力：立法權、行政權和外交權。立法權的行使是以資產階級為代表的議會，行政權由國王行使，而外交權則由專門的機構掌握。洛克更代表英國資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宣布立法權為最高權力，此項權力指導其他權力的活動，其他權力對於立法權則處於從屬地位。這就是意味着資產階級要壓倒封建統治階級。洛克這種主張是以英國當時的歷史為背景。當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由資產階級與貴族妥協，並以君主立憲政體的形成而告終結的。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關於劃分國家統治範圍的階級妥協，結果就使得關於分權的學說，成為支配17世紀末葉英國政治思想的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主要內容。

這個學說在18世紀法國的著名啟蒙學者沙利·路易·孟德斯鳩（1689—1755年）的著作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他的學說成為後來一切主張“三權分立”的基本依據。

孟德斯鳩所生活的時代，正是法國封建制度面臨崩潰，孕育着資產階級革命的大動蕩時代。他代表着法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在

他的著作中严厉批判了专制制度。

早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鳩就用文学方式抨击了已经腐朽了的法国专制制度，揭露了法王路易十四的专横和暴虐。在“法意”中，更从国家制度问题上来抨击了专制政体，提出了关于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的主张。

孟德斯鳩在“法意”中把国家政体分为“公治”（共和）、“君主”（立宪君主）和“专制”（君主政体）三种，在“公治”政体中，又分为“庶建”（民主政体）和“贤建”（贵族政体）两种。

在各种政体中，孟德斯鳩把专制政体看成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政体。他指出专制政体是“以一人而具无限之权利，惟所欲为，莫与忤者也”。专制君主“一身兼三物，为宪法、为国家、为王者”，他把国家看成“天下惟我一统无并立者”的“私物”。因此，专制君主必须实行恐怖政策，使人民都变成“怯懦”、“愚顽”、“志气销萎”、“无敢为非常之虑”的愚民、奴才，才能维护其统治。所以他說“未有专制之君而非奴隶者也”。他更指出在专制制度下，“国中之地皆王土，国中之民皆王臣”，人民无立锥之地；专制君主只顾搜刮人民以满足他自己和他左右的私欲，不注意国事的“修进改良”，结果“虽有至腴之息土，不数年生息尽矣”，造成了“相率不耕，田野荒蕪”的荒凉景象。因此，孟德斯鳩把专制政体看成“非可久之物”。

对于其他各种政体，孟德斯鳩虽然认为可以根据各国的国情（地域的大小、气候的寒暖、历史的传统等等）而设立，并无一定的成规，但实际上他却认为君主立宪政体是最好的国家制度。在他看来，即使是共和政体，无论为民主或贵族，从其组织上看“皆非自由者也”。只有“平和政府”才能保证实现公民的政治自由。实际上这种“平和政府”也就是被他理想化了的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

但是孟德斯鳩同时也指出，即使在君主立宪政体中，要想使政府不滥用其权力，使

人民的自由能够得到保障，也必须“凡立一权，不可不更立一权焉，以为之限制”。在这个基础上，他又提出了“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学说。

孟德斯鳩关于君主立宪和由此引申出的“三权分立”学说，只是进一步发展了洛克分权的主张，目的是为了改良，因而主张限制王权和保障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他在1748年出版的“法意”上写道：

“每一政体中，有三项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及（对内行政权）司法权。”

“立法权与行政权合由一人或一机关掌握，则不能有个人的政治自由，……假如司法权不与立法、行政分离，也不能有个人的政治自由，……一人或一机关而……独施此项权力，则一切不堪设想。”^①

根据孟德斯鳩对“三权分立”的分析，实际上是企图把立法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并使它监督行政权；行政权由封建君主独掌，它虽可对国会的立法有否决权，但无权立法，而且必须根据法律进行一切活动。至于司法权则是“独立”的“无所专属”。这种主张，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阶级关系。一方面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限制君权和要求政治权力以保护自己阶级经济利益的愿望；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当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同封建制度的妥协性，他们企图通过这种方法来达到调和各等级利益的目的。

从“三权分立”学说产生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当资产阶级的力量还软弱的时候，分权理论，以馬克威里为代表，为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乞讨一部分权力，乞讨一份在宪法里的地位；当资产阶级的势力大过封建势力的时候，分权理论，以洛克为代表，主张立法与行政分离，并且要求立法应高过行政，即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议会高过国王；最后，分权理论的“集大成”者孟德斯

① 文中关于孟德斯鳩的主张，系摘录自“法意”第2卷第1、2、5等章，严复译述，商务印书馆发行。

鳩，則反映了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意图向封建阶级争得一份统治权，并谋求与封建势力的妥协。从馬克威里、洛克到孟德斯鳩，不同内容的分权学说，正反映了历史上资产阶级势力的发展的不同情况。这样看来，分权理论恰恰反映了资产阶级向封建统治阶级争权的历史要求。正如馬克思所说：“在一个时代，在某一国中，在那儿有王权、贵族、资产阶级在争夺统治权，那儿的统治权因而是分裂着的时候，在这儿便会有分权说作为支配的思想而发生，不久更将被宣称为‘永恒的法則’”^①。这正是分权论产生的历史背景生动的写照。

“三权分立”学说产生的历史及其阶级本质既然如此，那么为“三权分立”作辩护的所谓“分权、制衡”的谬论，事实上也是极易識破的。因为国家政权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它是统治的工具，是专政的武器，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立法、行政、司法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工，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分权、制衡”。尽管资产阶级“学者”們一般都认为分权是为了制衡，要制衡就必须分权，所谓“分权”和“制衡”是同一原则的两个方面。尽管他們徒然地企图这样解释：国家权力的三个部分（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如果是互相牵制的话，那么，权力間就能够取得平衡的状态，“自由”就能够获得保障，而权力的分立正是为使权力互相牵制而得到平衡。但請問：资产阶级的立法机关通过反动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资产阶级行政机关管理着资产阶级的日常事务——捉捕“盜賊”，镇压革命，掠夺殖民地，进行侵略战争；所谓立法与行政的“分立”与“制衡”，究竟在哪儿呢？

资产阶级及其奴僕們說：“司法独立”，才有可能保证公正地、无偏私地执行法律。馬克思說得好：“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簡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

那末大公无私的判決还能有什么意义呢？”^②这对于资产阶级吹嘘“司法独立”以保障公正地执行法律，是最好的回答！法院既然忠实地执行国会所通过的镇压人民的反动法律，那么它和国会、总统的“分立”与“制衡”在哪儿呢？

显然，在镇压人民的职能上，三者的步調完全一致，三者的反动程度完全一样，沒有絲毫的分歧，談不上冲突，更談不上冲突中“彼此制衡，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质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总是资产阶级专政”^③。所以孟德斯鳩的“三权分立”学说是虚构的、荒謬的，和社会发展規律的科学理解背道而馳。

二、资产阶级宪法中的“三权分立”制

孟德斯鳩的“三权分立”学说，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理想而已，在实际上所谓“三权分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是，由于“三权分立”的学说，一方面可以用来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实质，特别是“司法独立”，表现得非常明显。所以，不論资产阶级国家政体如何，都一致地标榜着“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等等，用所谓“超阶级”、“超政治”的谎言和伪善来欺騙和麻痹劳动群众，以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三权分立”学说，还可以緩和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通过議会的爭吵，法院的伪装超然，不让这种内部冲突成为削弱阶级力量的原因，从而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基于这两方面的理由，美国在1787年便制定了一个典型的“三权分立”宪法。美国的资产阶级接受“三权分立”的学说，并以国家的根本法——宪法形

①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态”，群益出版社版，第91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78頁。

③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00頁。

式巩固下来，是否果真意图建立一个合乎“全民利益”的“三权分立”制的政府呢？

我們只要翻开北美十三州独立和制宪的历史，便可以得到回答。

北美十三州为反抗英国的侵略所进行的民族独立战争虽然结束，但当时美国国内外的危机并未消除。和英国的商务断绝了（英国想以此来扼杀这个新生的国家，使其重返于英国殖民地状态）。国内各州的关卡林立，阻碍商品的流通；国际上也陷于孤立的地位。当时北美十三州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危机迫使十三州资产阶级有组织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的要求。但是组成一个联邦国家，又有矛盾。大州的资产阶级要求组成联邦后横暴专政，小州的资产阶级则害怕组成联邦以后，受大州资产阶级的欺压。于是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时就分成两派：一是联邦派，代表大州资产阶级（当时势力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派是邦联派，代表小州资产阶级（当时势力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两派之间，在北美联邦制宪会议时期展开了斗争。

两派代表着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这可以从费城制宪会议当时所提出的两个方案清楚看出：

（一）“佛琴尼亚方案”：代表佛琴尼亚，宾夕文尼亚，麻萨诸塞，南、北加利福尼亚，卡洛林纳，乔治亚等大州的资产阶级利益，主张：立法机关分上、下两院，下院由各州人民所推选代表组成，小州如第拉瓦，罗特岛只应有一个代表，大州如佛琴尼亚，麻萨诸塞，甚至应有十六或十七个代表；上院由下院产生。

（二）“新泽西方案”：代表新泽西，第拉瓦，玛利兰，康涅狄格，纽约等小州的资产阶级利益，主张：保留州与州的平等，或州的主权。

这两个内容悬殊的方案，反映出北美十三州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

代表大州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派（以该

派领袖汉密尔敦为代表）不采取分权理论，代表小州资产阶级利益的邦联派（以该派领袖杰佛逊为代表）则坚持“三权分立”，幻想以此保卫小州的利益。

联邦派领袖汉密尔敦主张：选举的行政首脑终身职；对国家立法享有绝对的否决权；享有任命州长之权；州长对州立立法亦有同样的否决权；上院议员在财产基础上产生，终身职；下院由男子选举；一切由联邦政府控制^①。一句话，联邦派要求大资产阶级的横暴专政。

邦联派的领袖杰佛逊代表小州的利益，则坚持着“三权分立”的主张，他说：“为了对付外部的事务，使我们组成一个国家，对内，我们则划清界线；这便给了我们适当划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权力的轮廓。但是为了使我們给予联邦首脑的权力得到最优良的效果，它的权力，必须和各州一样地，划分为行政、立法和司法。”^②“好的政府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行政、立法、司法的分立，而且立法权分由两个或三个部门掌握。”^③

美国资产阶级最终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于是，北美联邦组成了；“新泽西方案”被否决了；“佛琴尼亚方案”也修改了。于是拟成了“三权分立”的美国联邦宪法的条文。

从1787年北美联邦制宪会议中两派激烈的争论的历史事实，就可以充分看出：美国宪法之所以采取“三权分立”制，并不是为了什么保障“全民的个人自由”，而是为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为了协调大州和小州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实际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显然，如果“三权分立”制原先在欧洲各国被用来起着协调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作用，那么在美国却被用来协调着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从实际情况上看，美国宪法虽然标榜

① 汉密尔敦：“大英百科全书”第11卷，英文版，第122页。

② “杰佛逊言论汇编”：1786年“给麦迪生的信”，纽约—伦敦英文版，第169页。

③ 同上书：1787年“给约翰·亚当的信”，第387页。

“三权分立”，但也只不过是為了掩盖资产阶级专政，实际上从来也没有实现过。如果說美国1787年的宪法及其早期的修正案，由于那时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曾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即列宁所說的狭窄的、残缺的、虚伪的民主，反映在法制上，也是如此，即具有一定程度的、殘破的、虚伪的法制。那么，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美国无产阶级和一切进步人士，为了反对美国統治集团在对內和对外方面的反动政策，曾經利用了美国宪法上所宣告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的残余，向美国統治阶级进行了頑强的斗争，因此，美国的壟断資本家的奴仆——美国政府的首脑們便不得不改弦易轍，完全拋棄了18世紀独立战争时代的“自由”“民主”的旗帜，踐踏了曾經被宣布为“神圣的”、1787年制定的“三权分立”的宪法原則，公开走上了法西斯化的道路。所謂分立的三权已經强度地集中統一在壟断資本集团手里。

在立法方面，美国宪法第一条一款規定：“本宪法所授与之立法权，均属于由参議院与众議院組成之合众国国会。”我們知道，美国的所謂国会，并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机关，而是壟断資本家借以維護其統治的极重要的工具之一。美国国会的活动是资产阶级民主沒落、腐朽的最明显的例証。国会的立法始終是用来維護統治阶级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以及奴役群众的。例如：美国国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了一系列違背美国宪法的法律。在1947年8月施行的塔夫脫—哈特萊法和1950年9月通过的麦卡倫法，都是彻头彻尾地違反了美国宪法上关于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規定，从而也就破坏了美国的宪法。尽管如此，美国統治集团，仍感不安，最近美国参議院又通过了一項肯尼迪—欧文法案。这项把工会置于政府严格控制下的法案，目的在于加强塔夫脫—哈特萊反劳工法。它規定劳工部长有絕對的

权力迫使任何一个工会向他提出詳細的財政收支报告和工会其他重要档案，并有权把这些文件交給資方。劳工部长也有权随意調查所有工会的記錄，对工会和工会干部进行起訴，宣布工会章程为非法，以及要求法院宣布工会的选举无效，并由政府包办工会选举等等。再如1954年8月生效的“共产党管制法”，根据这个法案的規定，美国共产党实际上处于非法的状态，这是对美国宪法惊人的破坏，是用法西斯的方式扼杀先法修正案第一条上所規定的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的具体表现。正如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福斯特同志所說：“美国联邦立法的历史（以及各州立法的历史），在我所写的这一时期，即在我生活的六十八年之内，首先是保护資本家利益的历史”①。

在行政方面，美国宪法第二条一款規定：“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大总统。”我們知道，在帝国主义时代，美国总统是壟断資本家最忠实的“看家狗”。在“分权”原則的掩盖下，宪法赋予总统很大的权力，完全可以說，总统的权力已經超过了君主的权力。他往往不顾什么宪法的“分权”原則，广泛地通过自己的咨文来发布反动的政策，发布代替法律、修改法律的命令。他在实际上行使着立法权。他还指揮军队、警察，直接镇压工人运动和和平民主运动等等。总统权变成了壟断資本家的直接独裁，凡是对資本家稍有不利的制度，它就要加以消灭。它是一小撮剝削者无法无天地統治全体美国人民的工具。为了集中一切权力于总统，所有破坏宪法的手段都采用了：什么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能在“口袋里否决”呀；总统公开拉攏国会议員的“政党分贓制度”呀；什么使总统享有实际立法权的“空白法案”呀；等等。使国会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受到总统的支配。

当然，国会和总统之間的爭吵是有的，

① 威廉·福斯特：“世界資本主义的末日”，苏联外国書籍出版局，1951年俄文版，第67頁。

直到現在，它們有时还要爭吵。但是，这不过反映了資本家陣营內部个别亿万富翁集團間发生了小的冲突。国会和总统之間并不存在真正的矛盾。因为国会并不是总统的敌人，他們都是壟断資本家手中的工具，都是为美国老板服务的。只是总统权对壟断資本家更加方便和忠实可靠。因为国会毕竟还是多数人，总统是一个人，一个人总比多数人更易或“更有效地”被控制。只要选中一个久經考驗的忠实奴仆，在四年一度的选举中提拔出来，推上独裁者的宝座，集中一切权力于他，他便将是华尔街的唯命是听的、最如意的走狗。

在司法方面：美国宪法第三条一款規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設立之初級法院。”費城制宪會議时，宪法起草者有意識地不将最高法院很快即已取得的那些权限規定在宪法里，是由于他們衷心希望最高法院能够按照他們的意图，在国会被迫不得不根据人民的要求而通过与統治階級利益相抵触的法令时，起着扼杀进步立法的作用。費城制宪會議的代表P. 金格曾經公然宣称：“对于国会通过的法令与宪法是否符合而实行司法监督的原則，乃是制止人民代表向錢袋进攻的最有效的方法。”^①

显然，作为美国壟断組織專政工具的最高法院，在美国中央政权机关体系中，是占有特殊地位的。它能使国会、总统和各州立法机关因迫不得已而可能产生的民主願望成为泡影。

美国最高法院在自己許多的判決里，严重地限制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它在1952年拒絕更审因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而被控为“原子間諜”罪的罗森堡夫妇案件的請求，并同意把他們在电椅上执行死刑，就是明显例証。美国最高法院为了迫害美国工人階級的先进部队——共产党，还确认了反民主的史密斯法案和麦卡倫—伍德法

案为符合宪法的法案，并在其同意下逮捕了美共的十一位領袖，此外，八十七位共产党的杰出活动家也被捕入獄。反动派在取得美国最高“审判”机关的支持和嘱托后，更用监禁来威胁全体共产党员。

这就是美国行使司法权的最高法院伪装超然的真相。

綜上所述：美国国会——通过臭名远揚的反劳工法塔夫脫—哈特萊和肯尼迪—歐文法案以及镇压民主运动的麦卡倫法案等等；美国最高法院——确认反民主的史密斯和麦卡倫法案为符合宪法的法案，从而对共产党进行公开的迫害并判決罗森堡夫妇以死刑；美国总统——指揮軍隊、警察直接镇压工人运动和和平民主运动。請問：所謂“三权”的“分立”和“制衡”表現在那儿呢？如果硬說有“分立”，那么，这也只不过是国家机构的普通的分工而已。而这种“分工”的目的，只是便于壟断資本家更好地进行統治；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这种“分工”在实际上也就被取消了。所以尽管美国宪法規定：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属于法院，而实际上却是另一回事。如上所述事例清楚看出：立法权并不专属于国会，总统可用国情咨文来参与立法，甚至运用否决权直接干涉立法，还可以直接頒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来代替立法等等。美国最高法院实际上也行使立法权，它可以运用其解釋宪法的权力，认定某項法律符合宪法或宣布違宪而无效。另外总统还可以通过任命法官等权力直接左右司法权的行使。

这种情况正如法国共产党書記处書記杜克洛所說：“資產階級对某些宪法原則可以肯定地承认，只要这些原則在实际上不見諸具体的实施。”^②这是一針見血的話，資產階級

① 引自Л. А. 薩茨：“为壟断資本家服务的美国法院”，苏联国家法律書籍出版局1948年俄文版，第7頁。

② 杜克洛：“为和平、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人民要求而斗争”，世界知識出版社版，第68頁。

宪法的虚构性就表现在这里。

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问题的关键已不止在于它的宪法的虚构，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公开暴政。种种迹象都证明，今天支配着美国全部政治社会生活的已经不是什么宪法或者资产阶级法制一类过了时的东西了，而是肆意横行的联邦调查局、凶狂猖獗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麦卡锡主义一类的恐怖和迫害、以及所谓“实力政策”的疯狂叫嚣。这一切都说明，由于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由于千百万广大人民更清楚地亲身体验中认识到统治阶级的狰狞面目，虚构的宪法本身已经不能发生什么实际效用，法西斯主义便发展成为一种直接威胁的力量，横行于美国。因而，虚构的宪法连同宪法中的所谓“三权分立”制，如同虚构的资产阶级“民主”一样，实际上都已经被抛在一边了。

在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资产阶级也像美国资产阶级一样地玩了相同的手法。在1789年的“人权宣言”里宣称，如果在任何社会中，权利的保证没有着落，分权未加确立，那么那个社会就是没有宪法的社会。1791年的法国宪法就是根据所谓“分权”原则，规定了君主立宪政体。在这以后，随着阶级斗争的进展，政局迭经演变，资产阶级政党此上彼下，在革命直线向上发展的阶段中（1789—1794年），国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化逐步扩展，国会在相当程度上日益掌握国家大权，行政权不能不有所顾忌，然而，三权的界限也远不如孟德斯鸠规定的那么严格，更谈不上“互相制衡”。到了雅可宾专政（1793—1794年）而实现卢梭的主权统一不可分论，根本摈弃分权之说，在雅可宾革命政权组织中，将一切大权集中于国民公会手中，即议即行，形成强有力的专政，在内忧外患的严重关头，捍卫了法国的独立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并将革命推向最高发展阶段。在未及实现的雅可宾宪法（1793

年）中对统一的国家权力亦作相应规定。雅可宾专政失败后，大资产阶级复起，为了及时而有效地进行对内镇压和对外侵略，将国家机构改组，行政权由督政府（1794—1799年）而执政府（1799—1804年）获得日益强烈的扩大，国会日益顺从于行政权下，这一情况至拿破仑称帝（1804—1814年）而登峰造极，国会被连根拔去了。那还有什么“分权”可谈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制定了新的宪法（1946年）。这个宪法重新宣告拥护“人权宣言”。“人权宣言”曾经在法国劳动人民的巴黎公社失败后，为法国的反动资产阶级所公开摈弃，所以在1875年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中就根本没有提到“人权宣言”所宣布的原则。但是基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阶级斗争中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法国资产阶级又被迫不得不重新举起“人权宣言”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并在1946年宪法中，承认所谓“分权”原则，而实际上，则企图进行阶级统治。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宪法虽然非常庄严地宣告，国民议会单独享有立法权，该项权力不得委托代行，这样似乎国民议会是唯一的立法机关，但事实上，总统可以利用对法律的相对否决权（即有权要求立法机关重新讨论某一法律），干涉议会的立法；还可以通过宪法委员会（总统担任宪法委员会主席），审核法律是否违宪，以阻碍法律的通过。法国的总统还可以通过“最高司法会议”（总统任主席）的活动，通过管理普通法院等等来直接影响司法。

1946年法国宪法中所谓的“三权分立”制，本来也是一种虚构，事实上没有那末一回事。但是，戴高乐上台执政后所制定的宪法，却连这种虚构的东西，都感到是多余的了。

戴高乐宪法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独裁专制宪法。这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历史上最反动的宪法。宪法授与总统以独裁的全权。他可以任免总理和部长，不要议会批准。总统主持

部长會議并頒布法律。總統也主持与海外領地結成的联邦。總統負責談判并批准条約。總統是軍事首腦等等。

根据宪法第14条規定，總統可以在认为国内情况“危急”的时候，把全部行政权和立法权都抓到自己手里。虽然宪法第64条規定了“總統保證司法独立”，但紧接着就規定“最高司法會議协助總統”。

1946年宪法規定總統是由議會选举的。根据戴高乐宪法，總統是由主要是“知名人士”組成的特別选民团选举。尽管按照戴高乐宪法，国民議會已經降为純粹是諮詢机关的地位，可是總統认为国民議會对他有妨碍时，他还可以解散議會。这样，无限制的独裁的路綫就很明显了。

显而易见，戴高乐宪法拋棄了曾經被法国統治集团利用过的所謂“三权分立”原則，轉而采取了公开暴力的方法。这并不是偶然的現象。这是資本主义总危机所造成的現代資產階級宪法危机的必然結果。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資產階級国家宪

法中所标榜的“三权分立”，不仅在理論上是荒謬的，而在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資產階級的国会、政府和法院都只是在实现一个权——資產階級的統治权。資產階級国家宪法中所标榜的“三权分立”制，无非是为了欺騙和統治人民，便于更好地保卫資產階級的利益和加强資產階級的专政。

在帝国主义时代，不管如同美国宪法仍然标榜着“三权分立”也好，或像法国戴高乐宪法公然拋棄了“三权分立”也好，反正都是一样，即由于資產階級国家政治上日趋法西斯化，它們都不断地限制和削弱代議机关的作用，使之化为烏有，尽量扩大和加强行政、司法机关的权力，以便于壟断資產階級独裁专政。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總統独断专横的事实，說明了在今天国际形势下和国内階級斗争的日益尖銳，壟断資本統治集团，为了巩固自己不稳固的地位，已經不能使用老一套的欺騙方法了。这样，就使資產階級国家的宪法所一向标榜的“三权分立”制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动态

北京政法学院开展科学研究概况

我院 1952 年建院之初，还没有力量搞科学研究。1955 年以前曾订过两次科学研究规划，但只是初步的开展。到 1955 年，部分教师已经有一定的科学研究的经验和积累了若干资料，为开展科学研究创造了条件。

学校党组织当时明确指出：科学研究的要求是重点作起逐步提高，为提高教学质量服务。党的组织要重视科学研究，保证这一工作正确地逐步地开展起来。教师们根据实际情况订了科学研究计划，同时在三、四年级同学中组织了“科学研究小组”，各专业教师进行指导。参加科学研究的教师 1955 年是二十一人，到 1956 年就有七十六人，并分别在 1956 年、1957 年召开了两次科学讨论会。

在 1956 年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时，科学研究已有相当开展，但在教师中不普遍，当时讨论会会议士讨论了九篇论文，对大家起了推动和鼓舞作用。

1957 年第二次科学讨论会时，科学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大会上讨论了十五篇论文，质量也有一定的提高。

1958 年经过反右斗争、整风、双反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之后，清算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教师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了，端正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和摸到了一些经验，从此我院的科学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大跃进的阶段。

1958 年 7 月 1 日，在党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鼓舞下，院党委制定了 1958—1962 年的五年跃进规划，指出必须“大力开展科学研究，提高科学水平”，确定了为教学服务，为司法实践服务，为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斗争服务；反对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倾向，贯彻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及“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8 月，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于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全体师生员工紧密结合，学校内外通力合作，以冲天的干劲，深入人民公社和业务部门，结合教学、生产劳动和实际工作，实行边劳动、边工作、边学习、边科学研究，获得了劳动、思想、科学研究的全面丰收，写出了五百多篇文章。国庆九周年，我院组织了向党献礼的展览会。

紧接着，在国庆献礼已有成绩的基础上，又掀起了今年元旦献礼的新高潮，在两个月中，又编写出文章一千一百篇，资料汇编十六部，刑法等课程讲义三部。以上论著中意义较大和水平较高的有一百八十余篇（部）。在此基础上又组织了第二次展览会，出版了元旦献礼论文选集。

1959 年为了鼓足干劲，继续跃进，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典，我院各教研室和各年级制订了 1959 年度的科学研究计划。经过九个月的努力，除个别项目变动外，现已全部完成。共写出文章三百多篇，编写和审修司法鉴定、国家法等讲义十二部。我们选出其中两篇文章，在国庆节后，召开了我院第三次科学讨论会。这次讨论的文章内容是密切结合了政治思想实际和教学工作。

在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基础上，为了继续鼓足干劲，进一步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在“为政治和司法实践服务的方针下，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研究项目应首先着重于围绕与教学内容有关的问题，并努力完成国家委托的研究项目”的思想指导下，我院各教研室正在开始制订 1960 年至 1961 年度的科学研究计划。

（郑）

法律出版社初版新书

列宁論社会主义所有制

列宁著 法律出版社編 12月份出版 估价：0.95 元

本书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 1958 年版本譯出。

本书汇集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論文、講話以及通信等。列宁总结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經驗，发展了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学說；指出生产資料社会主义公有化的具体途徑，科学的拟定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及其发展前途。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所有制不可能在資本主义内部形成，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資本主义所有制，才能产生和确立。

社会主义所有制有两种形式：国家的，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

本书所有材料是按照編年順序排列的。内容丰富，是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員、大、专学校师生和科学研究人員的一本很好的学习資料。

現代資產階級法學理論的批判

图曼諾夫著 賈宝廉等譯 11月份出版 定价：0.55 元

本书是根据苏联法律书籍出版局 1957 年出版的 B. A. 图曼諾夫所著“現代資產階級法學理論的批判”一书譯出的。全书約十一万字。

本书批判了資產階級法學理論中的社会学說、心理学說、現代规范主义、“复兴的自然法”學說以及所謂“建帶关系說”等反动理論學說。它不仅揭穿了現代資產階級法學一般理論學說的反动本质，而且也針對着各种各样的反动理論观点进行了較為彻底的揭发和批判。

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摧毁这些反动的資產階級法學理論，树立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法學理論；它可以帮助我們在研究或学习法學理論中分清敌我，辨明是非。因此本书对政法院校师生法學研究工作者和政法机关干部來說，是一本有参考价值的书。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